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NSD

第014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

2023年5月

目 录

本期导读 01

学术聚焦 02

不要低估中国经济的潜力 林毅夫.....	02
中国经济的关键点与两会的看点 姚洋.....	04
产业结构转型与绿色低碳发展 王敏.....	07
展望2023年的中国经济 赵波.....	10

月度精选 15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世界意义——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林毅夫.....	15
循序渐进建设数据交易市场体系 黄益平.....	27
如何应对新一轮全球主权债务风险? 卢锋.....	30
数字货币的经济逻辑 徐远.....	35
不确定性下创业方向的判断与选择 谢绚丽.....	43

学院资讯 48



本期 导读

北大国发院简报

第014期

亲爱的读者：

感谢您的订阅，《北大国发院简报》第14期与您见面了。每一期，我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在信息过载、高噪音、碎片化的时代，为您精选高质量的内容，同时也方便您用相对集中的时间深度阅读。

2023年3月22日，北大国发院举办一年一度的两会解读报告会。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北大国发院院长、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姚洋，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敏，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赵波，共同围绕中国经济前景和2023年两会报告的相关热点话题

进行深入分享。本期简报的“学术聚焦”部分将几位老师的观点原文呈现。

“月度精选”部分包含五篇文章，分别是林毅夫教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世界意义的深度而系统的解读，黄益平教授对于数字交易市场建设的见解，卢锋教授对如何应对新一轮全球主权债务风险的建议，徐远副教授对数字货币的多年研究心得，以及谢绚丽副研究员对于不确定环境下创业战略的解析。

感谢您的阅读，也欢迎您的反馈。在简报最后，我们附有订阅二维码和联系方式。

主编：黄卓
执行主编：王贤青
2023年5月10日



不要低估中国经济的潜力¹

林毅夫

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南南学院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大家对于今年的两会会有很多期待，因为两会关系到新一年的布局。今年是党的二十大之后的第一年，是从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到正常生活的第一年，也是新一届政府上台的第一年。新一届政府对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会有怎样的政策措施，比如对民营经济的态度如何？房地产会不会有新政？对平台经济的管控会不会调整？新设立的政府机构如何运作？等等，都是大家在两会上讨论的问题。

我自己的感受是，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在两会上，大家普遍认为5.5%左右的目标比较保守，我个人也同意这个判断。在政协全体会议上，我就做了题为“激发潜在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发言。高质量发展是建立在发展基础上实现高质量，需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所讲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发展阶段来看，我个人认为中国在创新方面具备三个优势：

第一是后来者优势。我国现在总体上还处在追赶阶段，相当于德国在1940年代、日本在1950年代、韩国在1980年代对美国的追赶阶段（人均GDP为美国同期的25%左右）。这三个国家在和我国相同的追赶阶段实现了10多年平均每年人均GDP 8%以上的增长速度。它们能实现，表明我国也可以有这个潜力。

第二是换道超车优势。以数字为生产要素的新经济方兴未艾，其特性是新技术的研发周期特别短，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在新经济领域我国不仅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而且，我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有利于新技术取得突破和快速运用发展的人力资本多、国内市场大，还有产业配套齐全等条件，这个优势是德国、日本、韩国在追赶阶段时所没有。

第三，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德国、日本、韩国在追赶阶段，没有因为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导致外部打压遏制而被“卡脖子”的问题，这是中国在利用后来者优势进行追赶时的特殊困难。但

1. 本文根据林毅夫教授于2023年3月22日在北大国发院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4期“中国经济的前景”暨2023年两会解读报告会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是我国 85% 的制造业还处于相对传统的领域，不会被卡脖子，在高新领域的技术一般多个发达国家有，只有那些美国独家拥有的技术才有可能被卡脖子，对那些技术，我们可以用新型举国体制来克服，固然有代价，但不是死路，我们不仅有机会克服挑战，甚至有可能开创出一条新路。

除了上述三个技术创新的优势之外，我国还有人口质量红利的优势。实现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有效劳动，中国虽然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但是我国人口质量的红利随着新增劳动力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增长。同时，人工智能也将减少劳动力数量下降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

同时，我们还有巨型国内市场的优势。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市场，即使用市场汇率计算也是世界第二大市场。

综合上述考虑，我国在 2035 年之前应该每年有 8% 的增长潜力。当然，这是从供给侧的技术可能性来看，在落实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实现双碳目标、绿色发展、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照顾弱势群体以及应对国内国外各种挑战的问题。如果我们能把上述优势用好，我个人认为在 2035 年之前实现 6% 左右的年均增长完全有可能。

就 2023 年的增长而言则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经济反弹。去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只有 3%，远远低于增长潜力。去年增速低，今年就会有反弹。正如我们 2021 年的增长达到 8.1%，是因为前一年只有 2.2% 的增长。

大家普遍感觉我们今年应该有 6% 以上的增长，但为什么政府工作报告定的增长目标只有 5% 左右？我个人认为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上一任总理做的，如果把目标定得高，给新领导班子的余地就有限，所以把目标定得稍微保守一些，有利于新领导班子拥有更宽松的施政空间。

第二，国际上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近几年来，

国际上的“黑天鹅”事件时有发生。已经持续一年的俄乌冲突尚未得到解决，下一步会不会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而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再比如，二十大报告里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惊涛骇浪级的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出现，甚至加码。这种地缘政治如果往坏的方向发展，也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国际金融市场状况同样不可预期，最近美国有三家银行“暴雷”，瑞信被瑞银收购。国际金融危机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类似“黑天鹅”事件如果发生，我们的经济增长肯定会受到不利影响，因此，把增长目标定高了就很难实现。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 6% 左右，有 8% 的潜力，定 6% 的目标是合适的。但由于奥密克戎，实际上只实现了 3% 的增长。经济学家都能理解，这是外部冲击的结果，但一般老百姓就不一定这样认为，可能会觉得目标没有实现。我想这也是今年把目标定得略低的可能考虑因素。

第三，有 8% 的增长潜力，实现 6% 左右的增长是对全国的增长速度而言，各地发展条件不同，有些地方应该高于这个速度，有些地方应该低于这个速度，但是，政府工作报告若定了这个目标各地都会尽全力去达到，这样可能使得一些没有条件的地方放弃了高质量发展的其他目标。所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目标定得略为保守有利于各种不同条件的地方都能更好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综上，我个人的判断是：我国有 8% 的增长潜力，但考虑到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因素，以 5% 左右为目标是合适的。新一届政府以组合拳来拼经济，实际达到 6% 左右的经济增长是有可能的。很多省在人大会议上的报告普遍都将本省增长目标定在 6% 以上。我相信，除非有不可预期的大型“黑天鹅”事件爆发，我国今年实际增长 6% 左右的可能性很大，甚至有可能略高于 6%。这当然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中国经济的关键点与两会的看点²

姚洋

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院长、北大南南学院执行院长

我想讲三方面内容，分别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问题，中国今年的增长速度问题，以及外部环境变化的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三年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起伏很大，国际上也出现一些新动态，特别是美国企图和中国脱钩。这都让大家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产生了疑问，甚至有人把现在的中国比作 1990 年代的日本。如果这个比喻是对的，中国也许也会遇到日本“失去的三十年”那样的衰退。

林毅夫老师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证明，中国仍然具备增长的巨大潜力。从技术周期的角度看，我认为中国经济事实上是进入了“黄金时代”。中国增长速度的前一个“黄金时代”是本世纪的头十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速。

但是就技术角度而言，中国刚刚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

中国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一个黄金时代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我们的发展起点较低，有很多的传统经济可以模仿、追赶，很长时间内都在做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资本和技术相对密集一点的中高端制造业等传统产业，但一直未能完全抓住

新经济带来的引领性机遇，所以新经济目前仍由美国占主导。

尽管如此，中国的新兴互联网企业一直在蓬勃发展，虽然还未成为世界性的主导力量，但也走到了世界前列。就这一较小范围的产业而言，我们赶上了新一轮的技术周期。

美国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整个世界进入了低速增长甚至是发展停滞时期。因为他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去测量，发现技术进步没有带来经济增长。我认为问题出在他们对技术进步的度量方法上。由于摩尔定律的存在，技术进步越快的行业，价格跌得越多，以此为基础来度量经济增长潜力有问题，因为技术进步不可能不带来经济增长，否则大家不会自发推动技术进步。我也怀疑一些经济学家关于中国过去十几年技术进步的估算，因为他们算出的 TLP（全劳动生产率）是下降的，甚至趋近负数。我认为不太可能。我们的微观主体还有那么多的科研投入，不太可能没有产出。

这一轮技术周期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人工智能、新能源、电动汽车、生物医药。在这四个领域，中国都在一定程度上走到了世界前沿，生物医药稍差一些，也基本赶上了。这大概是中国第一次全面地站在世界技术前沿上，并且在其中一些领域还拥有绝对的领先地位，甚至形成了碾压式的优势。

2. 本文根据姚洋教授于2023年3月22日在北大国发院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4期“中国经济的前景”暨2023年两会解读报告会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比如新能源领域，太阳能是世界能源转型的重点，相比核能有很大优势，而中国在这方面具有碾压式的优势。中国本土生产的太阳能设备在全世界的占比已超过70%，国外很多太阳能电池企业都已被中国收购，中国企业已经基本垄断这一行业。

在AI（人工智能）领域，我们尽管在核心技术方面还落后于美国，但差距不太大，在一代以内，相信我们通过努力就可以赶上。但是大家不要只盯着核心技术，事实上中国在AI的应用方面已经领先世界其他国家，比如在智慧城市领域，我们绝对是一骑绝尘，把别的国家甩在后面，说明我们在图像的识别处理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的优势更加明显，已经进入井喷式发展阶段。2021年和2022年，中国电动汽车销量都占到世界的60%以上，今年我们的销量可能会达到一千万辆，在世界的占比还会增加。欧洲计划在2035年停售燃油车，但它们的电动车产业想要在那之前赶上中国的难度非常大。

中国经济2023年的增长态势

两会之后，政府新班子的建立给我国政策环境带来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这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政策的制定会更加稳定，执行会更加坚决。李强总理说，我们要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可以预见，今后政策的制定应该会更加理性化、合理化，执行落实会更加有效。所以，制度环境方面会有很大的改善。

今年头两个月的开局不错，投资增长的态势比较好，制造业投资也在逐渐恢复。我个人判断，投资为今年GDP贡献的增长率将达到2%，去年是1.5%。

消费方面，房地产跌幅在缩小，今年有望止跌。房地产占GDP的比例很大，去年房地产增

加值下跌5.5个百分点，如果不下跌，我们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4%，而不是3%。房地产是长链条行业，除了建筑，还有装修、家用电器、装饰材料等等。如果房地产能止跌，甚至复苏，就会带动消费的重启。

现在看来，今年一二月份消费的增长态势尽管不太稳，但也不差。央行配合经济的复苏刚刚降息，我相信央行未来的政策会随着经济态势的发展继续适度调整。总体而言，今年央行政策会比较宽松适度。

财政不用多说，一直在加力。

算下来，今年消费有望增长6%-7%。过去正常年景的消费增长是7%-8%，如果消费增长6%，给GDP增长的贡献就是3.3%，如果7%，贡献就是3.8个百分点，这样加起来，今年的GDP增长速度大约在5.3%-5.8%。这是我的预判。

外部环境的变化

今年，发达国家进入了衰退期，可能是浅衰退，但如果美国真的爆发金融危机，衰退程度就很难说。以往的经验表明，发达国家暴发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实际影响并不大。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反倒一枝独秀。当然，这和我们的政策刺激有关。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当经济下行的时候就应该刺激，所以今年如果需要，我们肯定还是会有刺激政策。所以在我看来，如果发达国家暴发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应该也不太大，只是心理作用经常使我们夸大影响。

俄乌冲突已持续一年，对中国的不少企业的供应链有一定影响，尤其是能源和大宗商品的影响较大，但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影响并不太大。去年我们一直担心粮食供应会受影响，迅速加码国内的粮食生产。过去一年我们的通胀率依旧极低，食品价格也未上涨。中国是大国，吸收国际冲击



的能力比较强。

还有一个大家都很担心的问题是中美技术脱钩。美国想和中国在技术领域进行脱钩,这是事实,而且在不断加码。不断加码是由于他们过去的脱钩措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增加芯片领域的投资,并且美国也清楚脱钩对自身的损害,所以不想让制裁范围太大,采用“小院高墙”的策略。

对中国而言,制裁的影响相对可控。比如,实体清单上的中国企业已经有 640 多家,中国全部企业的数量是一千多万家,占比极其有限,中国经济整体层面受到的影响微弱。当然,在高科技芯片等“小院高墙”的重点领域确实受到一些影响。

一个国家在技术上替代另一个国家只能是“换道超车”,而非“弯道超车”。例如我们的电动汽车就是通过换一个赛道超越西方,而不是在同一个赛道上做得更好。国外传统汽车巨头依仗技

术优势雄厚,不愿放弃原来的技术,不愿切入新赛道,最终很可能势弱,甚至消亡。

现在美国跟我们打芯片战争,最近又加码,要求美国企业以及享受美国联邦政府“芯片制造补贴”的外国企业给中国卖芯片每单都不能超过规定上限。这个限制明显更严,意味着我们实体清单以外的企业购买指定企业的芯片也都要受限。这对我们的影响会加大。然而,就技术发展而言,现在是电子芯片,下一代可能是光子芯片。在光子芯片领域,中国已经身处世界第一阵营。光子芯片通道容量更大、能耗更低,非电子芯片所能比拟。如果光子芯片有朝一日量产,电子芯片就会完全落伍。很大可能性是光子芯片在五年之内实现 GPU 的商业化,十年之内实现 CPU 的商业化。果真如此的话,中国又会通过新辟赛道而超车西方。

因此,即使在中美竞争最激烈、美国对我们“卡脖子”最严重之时,我们也不要失去信心,路在脚下,且仍然宽广。

产业结构转型与绿色低碳发展³

王敏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

北大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稳步推进节能降碳。统筹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绿色低碳发展，科学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性，这也是对未来中国环境治理工作的定调。自习主席在2020年提出“双碳”目标以来，各行各业都在推进“双碳”工作。然而，我们在早期可能有点操之过急，尤其是在2021年，通过项目审批和拉闸限电等方式来完成能耗指标，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伤害。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教训，即绿色低碳发展必须和稳定结合起来。

我的解读是，实现“双碳”目标并非不惜一切代价，而应在尊重经济发展和市场规律的前提下，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实现低碳与经济有机结合。

因此，我今天的重点是探讨产业结构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之间的关系。

产业结构转型本身有规律可循

无论是污染物排放还是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工业生产活动和交通领域。其中，工业生产领域是最主要的排放来源。工业生产的发展具有其自然规律。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一个经济体的需求结构、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比较优势都会发生变化。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该经济体的工业GDP占比会先上升后下降。根据1950年以来所有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和产业结构数据，可以看到一个规律：当人均GDP达到1.5-2万美元（按2017年国际购买力平价水平计算）时，工业GDP占比会达到40%左右的峰值，然后缓慢下降。截至目前，德国、日本、韩国这些制造业比较强的国家，工业GDP占比大约在25%-33%之间，而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工业GDP占比在15%-20%之间。这是大致的规律。当工业GDP占比下降后，整个环境所受到的压力也会下降。这一判断非常重要。

过去十年我国产业结构已经发生剧变

在过去10年中，我国为环境治理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包括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和环保督察等措施。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产业结构也进行了剧烈调整。

2011年，我国人均GDP大约是1万美元左右（以2017年购买力平价换算为基准），工业

3. 本文根据王敏副教授于2023年3月22日在北大国发院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4期“中国经济的前景”暨2023年两会解读报告会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GDP 占比在当时达到了 46.5%，但到 2020 年下降了 9 个百分点。这是非常剧烈的产业结构调整。10 年间，我国工业 GDP 占比下降近 9 个百分点，而主要发达经济体工业 GDP 占比从最高点下降同等幅度基本要用上近 30 年的时间。

这当中有很多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人口，尤其是我国劳动力人口在 2012 年达到峰值后，劳动力成本迅速上涨。同时，去产能政策和非常严格的环境政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过去十年间，我国绿色发展方面进步明显，环境质量大幅度改善。例如，10 年前北京的 PM2.5 平均浓度是每立方米 80 多微克，现在降到 30 多。但我们为此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和成本。

城市化也已走过超高速增长阶段

在传统的环境质量问题得到大幅度改善之后，下一阶段的环境治理工作重点是碳排放问题。尤其是考虑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和低碳的有机结合。

就工业领域细分行业的碳排放数据来看，火电行业的碳排放约为全国化石能源碳排放总量的 44%，钢铁行业占 18%，水泥行业占 14%，交通运输领域占 10%。

为什么钢铁和水泥的碳排放占比这么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产量特别高。我国这两个行业的产量在全球的占比约为 57%，但主要满足国内需求，仅钢铁有很少量出口。钢铁产量 64% 左右用于建筑行业，而水泥则基本全部用于建筑。因此，这两个领域超高产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建筑需求的高速增长。而其背后更进一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在过去 20 年经历了超高速的城市化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将过去 20 年碳排放高速增长解读为，超高速城市化所驱动的对建筑、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需求的增长。

通过观察一些数据，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

一点。

在过去 20 年中，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增长 1.4 个百分点，每 10 年增长 14 个百分点。如果 14 亿人口在 10 年内增长 14 个百分点，相当于每 10 年有近 2 亿人口进城，每年城市人口新增 2 千万。2 亿人口这一数字非常巨大，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这样的城市人口高速增长驱动了对房地产、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的巨大需求。2000 年全国房屋施工面积为 16 亿平方米，而到了 2020 年则增长到 150 亿平米。同样，2000 年的汽车保有量为 0.16 亿辆，而到了 2020 年则增长到 2.7 亿辆。在过去 20 年中，超高速的城市化对高排放行业的需求增长是我国环境问题的一个基本面。

然而，城市化发展也有其基本规律。一般而言，在城市化率达到 70% 左右的水平后，其增速会急剧下降。此时，虽然城市率还会进一步上升，但会以较慢的速度增长。等城市率到达 80% 甚至 85% 左右时，城市化率基本处于稳态，不再进一步增长。

去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65%，而 70%–75% 是城市化率增速开始下降的一个经验值。考虑到我国特有的户籍政策，中国可能会比其他发达国家更早进入城市化增速下降的阶段。

韩国是最新晋升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之一。与中国类似，韩国在 1960 年至 1990 年的 30 年间经历了超高速的城市化发展，城市率平均每年增长 1.5 到 1.7 个百分点。然而，自 1990 年以后，韩国的城市化率增速开始下降：从 1990 年增长 1.58 个百分点，经过短短七年时间降至平均每年增长 0.3 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到，城市化增速一旦从高速增长进入低速增长的区间，调整的时间是非常快的。

观察中国的情况可以发现，2000 年至 2020 年期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上升 1.4 个百分点，相当于每 10 年有 2 亿人进城。然而，城市率的增速从 2016 年开始持续下降。我国的城市率增

速从 2015 年的 1.58 个百分点持续下降到 2021 年的 0.83 个百分点。受疫情冲击，2022 年我国城市率增速更是进一步下降到 0.3 个百分点。

人口变化趋势也减轻了“双碳”目标的压力

过去几年，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率增速会下降得如此之快？一方面与疫情影响人口的流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规律有关，尤其是新生人口数量断崖式的下降。

放开二胎政策后，新生人口数量一度大幅度上升，2016 年约为 1900 万，但之后持续下降，到去年只有 957 万。现在的婚育人口基本上是“90 后”。而 1991 年以后我国的新生婴儿数量一直在下降。这意味着未来二十多年我们的婚育人口总量将持续下降。也就是说，在生育率不变的情况下，未来新生人口数量仍将持续下降。未来几年新生人口可能会降至每年 900 万甚至更低。这是我国目前人口情况的基本面。

人口的另一个因素是总量。去年，我国人口总量下降了 85 万人。未来，人口数量下降的趋势可能会加剧。今年的人口数量下降很可能要超

过 100 万人，甚至可能达到 200 万人，未来的下降速度还会更快。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三年自然灾害，我们曾经有过生育高峰，每年新生人口数量约为 2100 万人。然而，再过五六年，这些建国以后出生的人口将进入死亡年龄。如果按照人均寿命 78 岁来计算，未来我国的死亡人口将不断增加。现在我国每年死亡人口已经超过 1000 万人，未来可能会达到 1500 万甚至 2000 万人，而未来新生人口数量只有每年 900 万人。因此，未来我国每年人口下降数量可能会超过 500 万人，甚至接近 1000 万人。

根据这两个大的判断——人口总量与城市化增速双双下降——整个国民经济对钢铁、水泥、交通、建筑等行业的需求也会开始下降，且趋势不可逆转。因此，我个人对“双碳”目标中的碳达峰比较乐观，因为整个宏观经济在环境问题上的压力将变得相对轻松。

我们之前曾经做过研究并撰写了报告，也一直在呼吁，未来十年，中国绿色发展的约束并不那么强，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绿色发展，完全可以多依赖更具有长效机制的经济政策手段，例如碳税、污染税或碳市场交易等市场化政策，减少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干预，特别是项目审批和拉闸限电等强行政性手段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展望 2023 年的中国经济⁴

赵波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

经济发展往往有一定的连续性和周期性。在展望 2023 年的中国经济之前，我们先看看中国近年来经济趋势的变化。

下图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数据。在去除周期性因素后，2011 年之前我国年度 GDP 增速在 9% 以上，而在 2011 年之后，我国年度 GDP 增速不断下降，目前已经降至 5%-6% 的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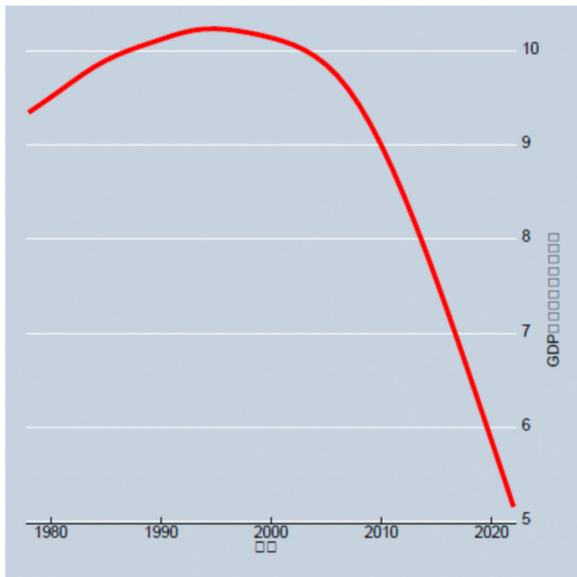


图 1. GDP 年度增速（趋势项）

经济增速放缓的背后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起作用，也与我们发展理念的主动转变有关。2017 年，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高质量”发展，标志着重大的发展理念的转变，意味着我们从高速增长的发展时期过渡到追求高质量增长的新阶段。

如何看待我国潜在经济增速的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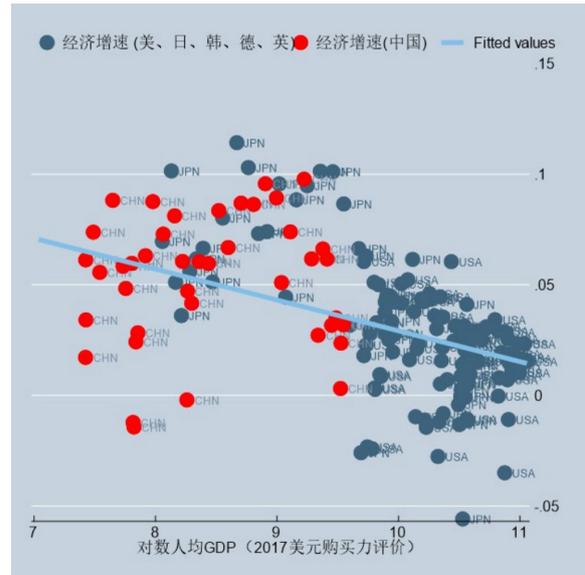


图 2. GDP 增速跨国比较

4. 本文根据赵波副教授于2023年3月22日在北大国发院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4期“中国经济的前景”暨2023年两会解读报告会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我国的 GDP 增速还能不能回到之前 8%、9% 以上的水平？图 2 给出了一些线索。图 2 是 GDP 增速的跨国对比，主要展示了二战后至今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红点代表中国，蓝点代表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英国。横轴代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水平。该图显示一国的经济增速会随着人均 GDP 水平的提高将不可避免地放缓，两者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到 2040-2050 年时，我国人均 GDP 增长可能只有 3%-4% 水平，不会再回到过去高增长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就显得尤其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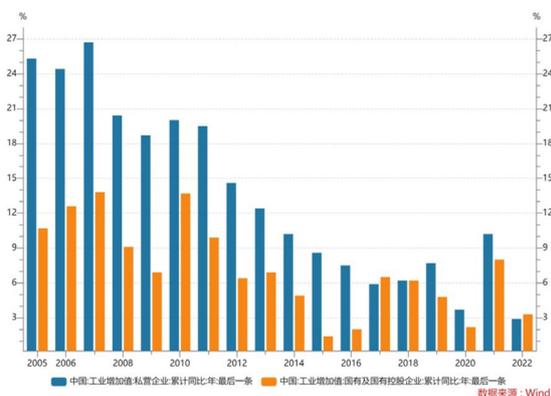


图 3. 工业增加值增速

企业增长是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图 3 展示的是我国工业企业增长的情况。在 2005 年左右，私营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增速约为同期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速的两倍，这说明我国私营企业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那之后，私营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速不断放缓，接近于国有企业的增速水平。这种情况可能存在多种解释，一种可能是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不断做大做强，其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实现了稳定的增长；而过去私营企业的高增长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等优势，而这些年来其优势不断减弱。

如何看我国 2023 年的经济前景？

结合上述背景，我想从五方面分享对高质量经济增长的一些理解，也是对今年经济增长的展望。

一、坚持技术和创新驱动型是根本

现在大家都在谈产业转型，但产业转型不一定会提升经济增速或者使经济高质量增长。在 2012-2021 年期间，我国低人均收入的省、直辖市的经济增速更高，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这种现象在经济学里被称为“区域之间的收敛”。随着收入水平上升，地区产业结构向服务业集中，地区经济增速将逐渐放缓。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中。随着经济发展，一国的工业占比往往会不断下降，而人均收入的增长让老百姓对服务类消费的需求不断上升，服务业占比也会随之进一步提升。然而绝大多数服务行业，比如传统的医疗服务、政府机构服务、餐饮以及娱乐业等，其生产率的创新性和技术进步率都非常低，这使得结构转型的同时，经济增速也不断放缓。这种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集中于生产率增速较低的部门的现象，被称之为“鲍莫尔成本病”。

服务业占比与经济增速间的负向关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对抗或缓解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必须通过不断创新才行。北京市的服务业占比高达 80%，但依然保持了不错的经济平均增速，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技术进步和创新。我国目前在一些重点发展领域实现“换道超车”，其实是一种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的创新驱动的发展。将数字化、信息化与传统行业结合，实现制造业的不断升级更新，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等等措施都能带来持续的创新并持续改进生产力，从而带来增长的持久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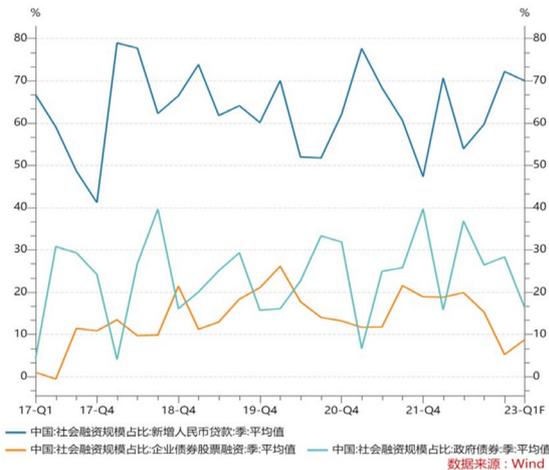
高质量的服务业发展，比如生产性服务业，要与制造业的发展紧密结合，不能相互脱离。这



种结合实际上改变了现有传统性的生产方式，能带来更多利润和更高附加值。脱离了制造业的服务业，其发展只能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除了市场驱动型的创新，国家推动的创新也非常必要。对一国的创新发展而言，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主导的创新非常重要。比如在 2022 年中央一般性公共预算当中，研究支出的增长高达 13.5%，在去年宏观经济只有 3% 增长的背景下，国家针对创新的投资力度仍如此之大，可想而知我国目前对于基础科研前沿探索的支持力度。

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很重要



上图展示了目前社会融资规模中新增社会融资的占比情况。最上面的折线代表了新增人民币贷款，占比为 70% 左右，这表明中国还是一个非常依赖间接融资且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大量资金要通过银行才能获得，这与发达国家的情况存在显著差别。相比之下，社会融资规模中位居第二的主要增量来自政府债券的发行，疫情期间尤为突出。剩下占比不足 10% 的代表企业债和股权融资，也就是直接融资。这意味着今天我们的企业从金融中获得的直接资源相对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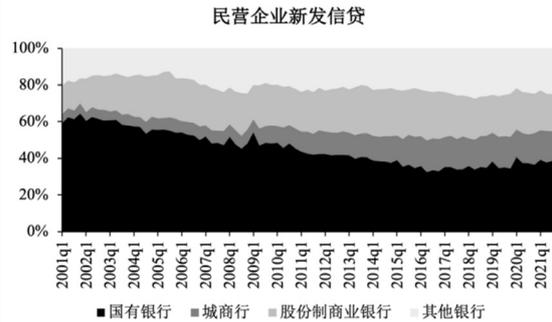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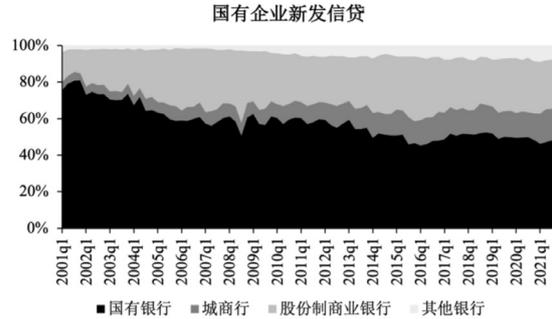


图 5: 国企 / 民企新发信贷来源

数据来源：李明浩等，“货币政策冲击与金融机构信贷扩张” 2023

我的同事李明浩老师的合作论文对比了国企、私企的信贷来源。从图 5 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目前新增信贷中有 50% 来自国有银行，而私营企业这一块的占比只有 40% 左右，比国有企业低 10%。剩下的融资渠道就是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对于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的私营企业而言，非常重要的融资来源就是图 5 中“其他银行”这一项，即包含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在内的其他中小金融机构。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还是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同等条件下，私营企业的融资能力弱于国有企业。学术界针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已经持续多年，目前看这一现象依然存在。

三、全球贸易仍是重要看点

二战后全球贸易额占全球 GDP 的比重大幅上升，在 2010 年后稳定在 50%-55% 左右的水平。全球化带来了贸易增长。然而在 2018 年之后，全球的贸易不确定性陡然增加。一些国家利用关税引发贸易争端，加剧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疫情后，2021 年全球贸易额增速很快，发展中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南南贸易大幅度增长。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增速只贡献了发展中国家的一半。2022 年下半年起，这一增速有所放缓，主要因为俄乌冲突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各国在疫情复苏后，继续承受来自通胀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以及各国央行为了遏制通胀推行紧缩政策带来的压力。在这三重压力的作用下，外界普遍预期 2023 年全球贸易增长的势头可能有所减弱。对中国而言，外贸贡献了约 20% 的 GDP 增长。因此 2023 年中国经济想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外贸仍然是一个关键点。

四、经济政策稳定至关重要

大家都非常关注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企业家不敢投资，老百姓不敢消费。究其原因，不确定性有的来自外部，比如国际局势，有的则来自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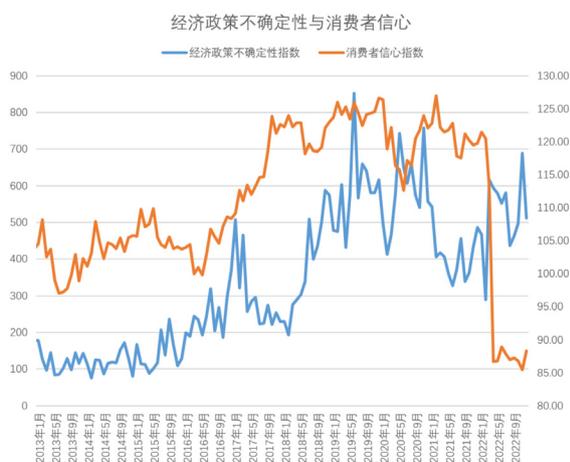


图 6.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消费者信心

数据来源: Baker et al (2013), Davis et al (2019), 国家统计局

图 6 中下方这条线代表的是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指数，上方这条线代表的是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不难看出这两者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当一国经济政策变得不确定时，消费者的信心会遭到削弱，其消费意愿也会随之减弱。

虽然我们无法控制外部的不确定性，但内部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政策的不确定性理论上是完全可控的。比如产业政策不要朝令夕改，不要一会促进、一会儿又打压。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应当建立良好、明确的沟通机制，让企业明确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比如地方政府是要就业、要税收、要双碳、要绿色环保，还是要带动当地的产业发展？我认为这是消除政策不确定性的一种重要途径，要给与私人企业、外资企业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政策预期。

五、社会保障和就业不容忽视

对老百姓而言，消除不确定性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增加社会保障的力度。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全国社保的统筹水平，包括取消户籍壁垒，特别是除特大城市以外的城市落户壁垒。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我们建立统一的要素市场和完善统一的劳动市场。只有构建统一的保障体系，市场上的劳动力才能充分流动起来，我们才能在人力资本情况给定的情况下，将我国经济潜在的产出最大化，减少劳动力资源的错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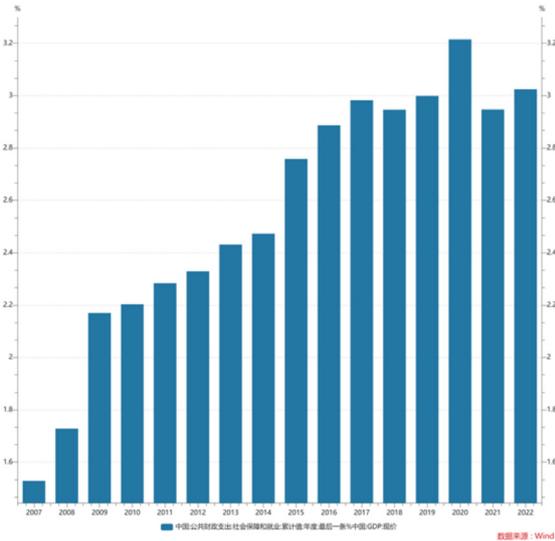


图 7. 社会保障支出占比

图 7 展示的是 2007 年至 2022 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的比重情况。不难看出这一占比一直在上升，现在已经达到 3% 左右的水平。2022 年，我国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约为 9.7 万亿元，增长了 17%，增幅很大，部分的受到疫情的影响。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将继续增大，在地方社保账户尚未实现全国统筹的情况下，倘若地方政府负担的不够多，中央财政支出的压力会增大，其转移支付的规模也会加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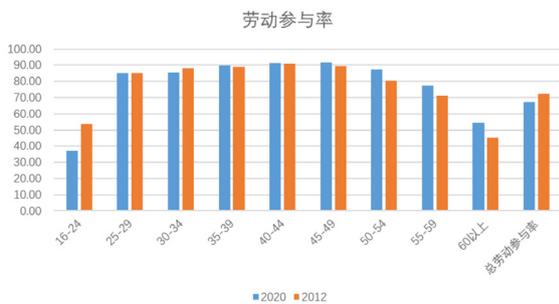


图 8. 劳动参与率 (就业 + 失业) / 劳动力人口, CFPS 12,20

图 8 展示了过去十年间我国的劳动参与率情况。最近大家非常关注失业率的问题，我个人对此不太担心，因为从上图不难看出，除了 16 岁 -24 岁这部分人群，我国其他年龄层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普遍非常高。事实上，过去十年间 50 岁以上这部分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显著的上升。这意味着，尽管没有明确修改退休年龄，而且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老龄化程度在慢慢加剧，但这部分人群仍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上，而且还具备一定优势。如果政府能统筹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让这部分人在退休后，能有底气地去其他城市二次创业，或者再换一份兼职工作，也将有助于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简单总结，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希望与挑战并存，通过从创新、金融、贸易、经济政策稳定性和社会保障和就业等五个方面的分析，我认为中国在 2023 年有机会实现高质量且中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但前提是在这五个方面都下足功夫。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世界意义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⁵

林毅夫

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南南学院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做了重要报告，提出了许多论断，规划了很多政策措施。我和各位一样，也在学习领会。二十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来自外部的打压随时可能升级，“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同时，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从现在开始的中心任务。

今天我想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分享我的心得与思考：

一、为什么会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该变局为什么会加速演进？我们应该如何驾驭大变局？

二、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三、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其世界意义是什么？

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总书记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论断。为什么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于经济是基础，且我研究的是经济，所以我想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来谈谈我对百年未有大变局的理解。

在20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当时的八国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它们是当时世界上的列强，之所以是列强，因为他们的经济、军事强盛，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占到全世界的50.4%。进入21世纪的2000年，世界上也有一个八国集团，其中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这七个国家也是八国联军的前七国，只有奥匈帝国被加拿大取代。

5. 本文根据林毅夫教授于2023年3月3日在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乡村大讲堂”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原因在于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解体，退出列强行列，被加拿大取而代之。

1900年八国列强的经济总量占到全世界的50.4%，整整一百年之后，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47%。经济是基础，八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半壁江山，所以整个20世纪的世界是和平或是战乱，基本上就取决于这八国之间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么爆发的？当时八国列强中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组成了同盟国，其他六个国家属于协约国，他们之间政治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无法摆平，于是爆发了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八个国家当中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组成了所谓轴心国，其他国家成为同盟国，由于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政治经济利益冲突摆不平，于是爆发了二战。

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里，世界的经济格局相当稳定，七八个大国始终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其全球经济比重从50.4%降为47%，仅下降了3.4个百分点。但为什么到2018年突然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

从经济角度可以看得很清楚。2018年，这八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从47%下降到34.7%，仅略高于三分之一。由于经济地位下滑，这八国主导世界的能力也随之下滑。

最明显的例子是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主导世界应对危机的国际治理机构由八国集团变为二十国集团。过去也出现过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但无非是这八国的领导人开会商定，其他国家照做即可，当然也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来执行。可是，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发生时，八国集团发现无能为力应对，所以，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在2008年12月牵头召开了二十国集团会议来共商对策。从2008年到现在，主导世界政治经济事务的机构就从八国集团变成了二十国集团。从八国集团至二十国集团的质变，这是在一百多年历史上不曾出现过

的事情。

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国集团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如此稳固，为何在21世纪出现巨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

20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到全世界的6.9%，2018年上升至16.8%，提升9.9个百分点。前面谈到，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从47%下降为34.7%，下滑12.3个百分点。计算可知，这八国集团下滑的12.3个百分点中有80%是中国崛起的结果。

在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中国人当然高兴，因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改善。

谁在此变局中的失落感最大？应当是美国。因为美国的经济总量在1875年左右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整个20世纪，美国一直是全世界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

再回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利益摆不平。一战爆发时，美国虽是协约国，但位置远离欧洲大陆战场，所以起初没有参战，德国和奥匈帝国横扫欧洲大陆；后来美国参战，由于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有能力以源源不断的物质投入到战场，成为打败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重要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同样的情形。战争开始时，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横扫战场，把同盟国的军队一一打败，英国、法国等从敦刻尔克撤退，进入所谓“至暗时刻”。后来为什么同盟军能打回来？因为美国参战，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资，从诺曼底登陆，打败了德国。在亚洲战场也是一样。起初日本狂妄宣称要“三个月亡华”，侵略了大半个中国及太平洋、南洋，但最终日本战败，原因之一也是日本在夏威夷把美国的军舰打掉了一大半，可是美国生产能力强，造军舰速度快，军舰很快得以补充。所以在中途岛战役时，尽管双方军舰损失数量一样多，可是美国有能力不断投入新的

战舰，最终打赢日本。尤其是美国最后还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可以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整个20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主导力量，是全世界的领头羊。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快速发展，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取得连续42年、平均每年9.2%的经济增长。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持续如此长时间，在人类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尤其是在规模这么大的国家。到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这是1875年以后美国第一次遭遇的情形。由于经济是基础，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失落感越来越强烈，所以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美国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其实美国一直在亚洲，它所谓的“重返亚太”是什么？就是把它驻扎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派来加强太平洋的第七舰队，想在中国周边形成军事包围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目的非常明确。特朗普政府时期，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跟中国打贸易战、科技战，同样是想抑制中国的发展。

如今美国是拜登担任总统，他基本没有改变奥巴马时代和特朗普时代的政策，而且又组织了以意识形态为边界的所谓“守卫民主国家同盟”，诱使其他国家与中国脱钩，抑制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的继续发展，这种状况可能会愈演愈烈。因此，遏制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美国两党的共同政策。

举个例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夫里·萨克斯，东欧剧变时“休克疗法”的提出者，他承认中国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优于他当时在苏联东欧倡导的休克疗法。现在他甚至在非洲国家推行中国的经验，帮助非洲国家的农村复兴，走的基本是中国的道路。他一直在网络上讲，美国遏制中国没道理，结果受到网络暴力，很多人群起而攻之，

最后他一气之下关掉了自己的自媒体账户。

这反映了一个事实，美国现在没有人能讲公正的话。只要中国继续稳定，继续谋发展，这种情绪很可能会越来越激烈。我想，这是总书记讲的“风高浪急”“惊涛骇浪”背后的原因。

作为世界经济的“老大”和“老二”，中美之间关系的变化，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世界。从贸易来看，中国现在是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其他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经济学告诉我们，贸易是双赢的，而且，在两国贸易中，小国得利多于大国，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也会给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机会。

总之，中美之间的矛盾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如何应对大变局

面对这样的问题和挑战，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想，中国的出路只有继续发展。

我个人的判断是，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世界大概就会进入和平稳定的新格局。原因如下：

中国的人口是美国四倍。现在我们是14亿人口，美国3.3亿人，虽然中国出现人口老龄化，美国人口可能还会增加，但是，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这一基本格局在可见的未来应该不会有大的改变。当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人均GDP一半时，我们的人口是它的四倍，那么我们的经济总量就是美国的两倍，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中国内部有地区差距，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收入水平处于领先的北京、天津、上海以及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三市五省的人均GDP大概会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而它们的人口加起来有4亿多，比



美国稍多一点，这代表这三市五省的经济总量会跟美国相当。更重要的是，人均 GDP 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也代表平均的产业和技术水平。如果这三市五省与美国的经济总量相当，并且产业技术水平也与美国的相当，就意味着美国相对中国将不再拥有多少技术优势。今天美国为什么拥有可以卡中国脖子的霸权？因为它有技术优势。到那时，美国没有了多少技术优势，它再想卡中国的脖子将无能为力。

我前面讲到，贸易是双赢的，小经济体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大于大经济体，所以，当中国的经济总量是美国两倍时，从中美贸易当中得到好处更多的就是美国。比如，美国那些大型高科技公司的研发投入非常多，而研发成功之后能获得多大的利润则取决于有多大的市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规模是美国的两倍，如果这些美国公司失去中国市场，研发成功后，可能就从高盈利变成低盈利甚至不盈利。而且，高科技产业必须不断投入才能维持技术领先，如果这些公司低盈利或不盈利，就无法继续投入研发。不仅这些美国大公司不能没有中国市场，美国很多老百姓必须靠中国提供的价廉物美的产品来维持生活水平。届时，中国的经济比美国大是美国没有手段改变的事实，而且，维持和中国友好的关系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美国应该就会心悦诚服接受中国的崛起。

我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原有的经济格局。面向未来，我们能否驾驭大变局，能否让世界进入新的稳定格局，同样有赖于中国的继续快速发展。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对内是如此，对外也一样。

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接下来，我再谈谈中国式现代化。

什么是现代化？纵观人类历史，西方国家在

十四、十五世纪有了“地理大发现”，从美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掠夺了很多资源；到 18 世纪以后，西方出现工业革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化社会；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而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没有进入工业化，所以就出现了现代社会的大分流，西方少数几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一半，主导整个世界格局，其他国家和地区大多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当时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一种“西天取经”的心态——认为西方国家那么强，一定有其道理，把那些道理学会，应用到自己的国家，就可以让自己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赶上发达国家。这种心态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知识界非常普遍，我小时候也这么认为。

但是，从前面所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发现，从 1900 年到 2000 年，八个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总量只下降 3.4 个百分点。一般而言，发达国家人口增长速度慢，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速度快。这意味着从人均量来看，经过这一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上进一步拉大，而非缩小。同时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此前普遍认为的“西天取经”模式走不通，至少效果不佳。大家想通过学习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工业化，借鉴西方的社会组织、政治组织来解决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但事与愿违。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快速发展，所以才能比较快地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能在 21 世纪的头十八年就将经济总量在全世界的占比上升了 9.9 个百分点，而且超过美国成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成功？我们将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就此，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

过去的普遍看法是，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的多党制等治理方式，但是那样做基本不成功，即使有少数东亚经济体成功了，也基本不是照搬西方的道路。比如，它们在追赶阶段多是一党领导，日本是自民党、韩国是民主共和党、中国台湾是国民党、新加坡是人民行动党。在政治上，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维持政治稳定。

当然，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有其共性。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人均GDP在18世纪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增长极慢。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指出，18世纪之前西欧国家的人均GDP每年平均增长0.05%。这意味着要想人均GDP翻一番，需要经过1400年。进入18世纪以后，人均GDP的增长率突然增加20倍，从0.05%变成0.1%，这样一来，70年就能翻一番。19世纪末到现在，西欧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增长又翻了一番，变成2%，35年就可以翻一番。这与18世纪以前相比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使西欧国家得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追求现代化，当然要走出“马尔萨斯陷阱”，而且人均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物资要不断丰富，这是共性。

但是中国式现代化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同于西方那些因工业革命而领先的国家。

第一个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目前，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工业化国家中的人口合计只有12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5.8%。中国有14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是18%。当中国实现现代化成为高收入国家以后，就会使世界的高收入国家人口翻一番。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经过二百年，才使高收入国家人口占全世界的15.8%，而我们一个国家就会使高收入国家人口翻一番还多，这是在人口受益

面上和西方式现代化的一个巨大差异。

第二个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虽然使平均收入水平提高，但是贫富差距在扩大。前几年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21世纪资本论》，由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所著。根据他的研究，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断在扩大。而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第三个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生活水平要提高，那么人的精神生活也应该不断丰富。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西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平均物质水平提高了，但是精神贫困的问题造成很多社会矛盾、冲突和黑暗现象的出现。

第四个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带来高度污染，二氧化碳过度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造成海平面上升、南北极冰川融化、极端气候频繁出现等，这都是西方现代化的后果。而我们要确保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第五个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是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依靠殖民掠夺和暴力战争的方式，持续积累财富的“掠夺式”现代化。而中国的发展一直是以贸易等和平的方式，实现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而且，中国的发展不仅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还给世界其他国家带去了发展机遇。

因此，和过去认为的只有西方式现代化一条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拥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

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中，第一个特征是先天的、给定的，因为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不是我们的后天选择。其他四个特征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我们道路选择而取得的结果。现在中国仍然存在收入分配差距，但是我们希望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希望在物质水平提高的过程当中，精神也不断丰富，实现物质文明跟精神文明的协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是重复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而我们是有意地选择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也是我们的选择，我们不称霸，不侵占其他国家。

我们要思考，怎么样才能实现后四个特征所要达到的目标？

大家知道，我一直在倡导总结中国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根据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后四个特征，关键点是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根据一个国家在每个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帮助企业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

如果能做到这些，我们就能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几个特征。

首先，如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就可以在初次分配的时候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生产成本会最低，并且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可以把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这就是效率。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在早期阶段一定是资本相对短缺，而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就会发展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并且用劳动力比较密集的技术来生产，就会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但如果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采用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创造的就业机会就少。按照本国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劳动力多的时候就选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

农业、工业都是如此，同时使用劳动力密集的技术，就会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知道，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穷人的特性是缺资本，依靠劳动力来获取收入，而富人则主要靠资本获取收入。如果能够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就能让那些收入水平低的人有最大的就业机会，从而分享发展的果实。不仅如此，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会最有效率，最有竞争力，这样经济发展会最快，资本也会积累最快。这样一来，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工资会上涨得非常快。举个例子，上世纪80、90年代，在北京雇一名保姆一个月大概要花费几十、一百元，现在则需要五六千元，如果是住在家里的，甚至要上万，大概你的工资一半要给保姆。因为现在劳动力短缺，所以工资上涨非常快，穷人的劳动力资产会变得越来越值钱。反过来讲，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资本积累速度会非常快，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相对丰富之后，资本的相对回报率，尤其相对于劳动力的回报率就会下降得非常快。于是，穷人的劳动力资产越来越值钱，富人的资产则不断相对贬值，收入分配因此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均。

新结构经济学做了不少实证研究，发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收入分配比较平均。在我们国内也是这样，越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的地区和省份，收入分配就越平均；越是违背比较优势来发展的地方，收入分配就越不平均。所以，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在初次分配的时候就可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同时，在收入二次分配方面，政府也会更有能力来解决地区、城乡和个人的收入分配问题。由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最有效率，经济发展会最快，政府的财政也会增加得最多。而且，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就有了自生能力，不需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就能生存，只要经营得好就能赚钱。当企业不需要政府

的保护补贴，政府财政税收增加就能更多地去解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而且能够投资于教育，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不仅如此，在经济周期波动或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临时失业者，政府也更有能力来帮助这些人。当然，政府也会更有能力解决鳏寡孤独等弱势人群的福利照护问题。因此，也能够更好地用二次分配来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

此外，中国文化中一直就有“己立立人，己达人”的思想。在这种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税收各方面能够鼓励收入比较高的人做一些捐赠，就有助于更好地进行三次分配（慈善公益捐赠）。如果企业是违反比较优势发展，不具备自生能力，靠政府保护补贴才能生存，“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它怎么有能力和信心去做企业捐赠呢？

综上，要实现共同富裕，前提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

其次，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不仅能够最好地实现共同富裕，还有助于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国有一句话，“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在收入水平很低时，为了活命，解决温饱排在第一位，礼节荣辱退居其次。因此，只要收入水平不断快速提高，人们变得富裕之后，对荣辱、礼节等精神文明的需求层次就能随之提高。

不仅中国文化如此，美国现代社会心理学中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也是同理。所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能够让平均收入水平提高得最快，分配也最好，依此才能实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

再次，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水平增长最快，而且不只是少数人收入增长，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之后，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提高，就会更多地关心环境问题，反对污染，对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有更大的需求。政府需要满足人民不断增加的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这样，政府在法规、治理方面就会更注重生态环保。

从企业的角度看，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企业就具备自生能力，只要管理好，企业应该就能盈利，也就会有更高的意愿去采用绿色技术，去遵循环境法规，新结构经济学也在实证研究上证实了这一点。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好的方式还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

最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一定是和平的发展方式。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含义是什么？我们要把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好，变成竞争优势，那么，产品就不仅在国内市场有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也有竞争力，那么，就会要求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自己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我们就少生产，多从国外进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要求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这样的发展方式最有效率。同时，我们的发展也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市场。

依据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贸易来发展经济是互利双赢的，这样的发展当然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而不是靠殖民掠夺别国的资源。

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应该很快也会成为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届时，几乎各国跟中国贸易得到的好处都会大于中国自身从中得到的好处，这也奠定了和平发展的另一个基础。

总体而言，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维持政治稳定，发展经济，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我们要走的道路必须是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帮助企业按照我们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如果能做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就能够同时实现。第一个特征是先天给定的，后面四个特征在本质上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

如何看待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我们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



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大家都很关心，但是悲观或迷茫者众。这种情绪不是现在才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几乎每年都有。大家既关心国家发展，又忧心忡忡。

如我之前所言，如果中国人均 GDP 达到美国的一半，GDP 总量就是其 2 倍，世界格局将进入一个新平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也将实现。

但这一切能不能实现呢？关键是按照比较优势，我们能不能实现中高速发展，在本世纪中叶人均 GDP 达到美国的一半？我想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发展的本质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现有的产业技术必须不断创新，每个劳动者在现有的产业里可以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同时，产业不断升级，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从而可以把劳动力和各种资源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转移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唯有依靠这两个途径，生产力水平才能够不断提高。

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中国作为处在追赶阶段的国家，和工业革命以后那些发达国家相比有一个“后来者优势”。那些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收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一直是世界上最高，意味着它们的产业和技术都处于世界最前沿。因此，它们想要有新的技术和产业就只能靠自己发明，因为无处引进。然而，自己发明需要非常大的投入，风险非常高。

从历史经验来看，那些发达国家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到现在的人均 GDP 的年均增长率为 2%，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四十多年人均 GDP 的年均增长率达 8%，是发达国家的四倍。为什么能达到发达国家的四倍？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处在追赶阶段，人均 GDP 和劳动生产率水平都比发达国家低，对于企业家而言，可以依靠引进消化吸收做为技术创新的来源，不需要自己从头发明，其成本和风险比自己发明低。产业升级也是

同样的道理。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想要产业升级就必须自己发明。我们现有的产业附加值比它们低，只要进入附加值比现在高的产业，就能实现产业升级，相比自己从头发明的成本和风险更低，成长速度就会更快。

问题是，中国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一直靠这种引进消化吸收的方式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这种方式还有多大的潜力？

对此，争议颇多。有些人认为，东亚不少经济体当然也是靠后来者优势引进消化吸收，快速发展二三十年以后经济都大幅度减速，中国已经用了四十多年，经济是不是会减速更严重？

我个人的看法是，一国的技术或产业还能不能从发达国家引进消化吸收，作为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关键在于后来者优势已经用过多少年，而是与前沿的技术和产业的差距还有多大。

根据我可以看到的资料，2019 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 GDP 是美国的 22.6%，约为四分之一。这相当于德国在 1946 年、日本在 1956 年、韩国在 1985 年跟美国人均 GDP 的差距水平，当时这三国都处于追赶阶段。利用跟美国的产业技术差距，即所谓的后来者优势，德国从 1946 年到 1962 年维持了 16 年平均每年 9.4% 的经济增长，日本从 1956 年到 1972 年维持了 16 年平均每年 9.6% 的增长，韩国从 1985 年到 2001 年维持了 16 年平均每年 9% 的增长。如果看人均量，德国从 1946 年到 1962 年，平均每年人口增长是 0.8%，所以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是 8.6%；日本在那 16 年间平均每年人口增长是 1%，所以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是 8.6%；韩国 16 年间平均每年人口增长是 0.9%，所以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是 8.1%。

德国、日本、韩国处于中国和美国近似差距的阶段，利用后来者优势，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都在 8% 以上。这意味着中国应该也有这样的增长潜力。而且，中国和当时的德国、日本、韩

国相比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如今出现了新经济，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诸多新产业。

这些新产业有什么特性？

第一，它是新产业、新技术，我们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第二，更重要的是，传统产业的研发主要靠大量资本投入，而且研发周期特别长，而人工智能、大数据这类新技术的研发周期短，需要的金融物质资本相对少，以人力资本为主。中国是 14 亿人口的大国，人力资本丰富，工程师多、天才多。而且，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所以新经济的技术研发出来以后，马上可以进入大市场，实现规模经济，进而降低成本，提升综合竞争力。

第三，如果新经济需要硬件，中国有最齐全的产业配套。

因此，我们在新经济方面和除了美国之外的任何发达国家比都有竞争优势。这些年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一直在和美国争第一，这也是德国、日本、韩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阶段时所没有的优势。

当然，与德国、日本、韩国相比，我们也有不利之处，因为它们在追赶美国时没有受到美国如此严重的打压。美国现在对我们采取所有可用的手段，施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在军事、科技、金融、意识形态等多方面打压我们。

如前所述，中国要继续创新，很重要的法宝之一是后来者优势。可是美国不把高科技卖给我们，想方设法卡脖子。但美国这样做也要付出代价，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比如，美国有优势的芯片等高科技产业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才能够取得技术突破，之后能获得多大的利润取决于有多大的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因此，如果那些高科技企业不把技术卖给我们，它们可

能就从高盈利变成低盈利，甚至亏损。这些行业需要持续高水平的研发投入，如果没有高盈利支撑，研发投入跟不上，很难再持续领先。

因此，美国为维持霸主地位，从政治利益角度想卡中国的脖子，美国自己的企业表面上不得不遵守美国的法令，但在执行时恐怕会心不甘情不愿。例如，华为是最早被卡脖子的，美国禁止高通向华为出售芯片。可是 2021 年年底，高通向美国国务院申请到了特别许可，继续给华为卖芯片。因为失去华为这个大客户，其损失太大，所以高通想方设法规避美国政府的禁令。

美国希望用所谓“意识形态同盟”要求所有发达国家都跟中国脱钩，美国的企业尽管不情愿，也很难完全违抗美国政府。可是，欧洲、日本企业如果跟中国脱钩，同样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它们的损失是自己的，只是为美国维持霸权作嫁衣裳，何苦损己利人？因此，其他国家不愿意和中国脱钩，所以阿斯麦尔才会拼命给中国卖光刻机，德国总理、法国总统等欧洲国家领导人才会积极访华。

“卡脖子”在所难免，但我们仔细分析以后就明白，真正能卡中国脖子的只会是美国独有的技术，对此，我们必须用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克难。但其他方面，中国仍然可以利用比较优势来发展，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如此，我们的市场会增长得最快，本来已经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市场，就还会成为增长最快的市场。美国及其他国家会逐渐意识到，对中国的打压损人不利己。而且，如果我们能够用好新型举国体制，一旦突破了被卡脖子的技术，这一技术的价格会马上下降，其他国家的企业从而失去竞争力。

在这种状况之下，只要我们自己能够保持头脑清晰，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只要克服了美国独有技术的“卡脖子”难题，我相信，在 2035 年以前就能和追赶阶段的德国、日本、韩国一样，拥有年均 8% 的增长潜力。



当然,这个增长潜力是供给侧的技术可能性,实际增长还要看我们的实际努力,比如能不能用好后来者优势、高质量发展等等。但我估计,有8%的潜力,维持6%的增长完全有可能。

接下来,从2036年到2049年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期,用同样的方式来分析,中国应该还有每年6%的增长潜力(供给侧的技术可能性)。再加上要克服“卡脖子”等问题,我估计可以实现4%左右的增长。如果从2020年到2035年能够实现年均6%左右的增长,从2036年到2049年能实现年均4%左右的增长,中国到2049年人均GDP应该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和中国式现代化即可实现。

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不只是中国自己的发展,作为世界第一大国,中国的发展还有不同凡响的世界意义。

追赶上发达国家,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梦想。然而,根据前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分析,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间,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是扩大而不是缩小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原来认为应该按照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发展,但大多都没有成功,仍然长期陷于低收入陷阱或是中等收入陷阱;而少数能赶上的就只有东亚几个经济体。

中国如果能够追赶上发达国家,将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不仅如此,中国式现代化就能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一个新的选择方案。

我们多数人在读书和受教育的过程中,可能都容易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因为人类迄今为止的现代化就只有西方走出来的这一条路。西方现代化的这条道路当然有我们必须学习总结的经验,但不能轻易在两者之间划等号。历史事实显示,

走西方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没有取得现代化的成功。

如果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努力成功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类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值得反思或更新。

迄今为止,人类关于“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和实践都来自西方,现代化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理论是什么?理论就是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当中抽象出一个它认为的决定因素,比如,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共和宪政等等,进而形成理论。在理论模型里,某个变量会是最关键的变量,没有这个变量的发展就不会成功。

然而,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其社会经济变量都成千上万,非关键变量不保留在理论模型里,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所以,任何理论的构建其实是两个过程,一个是提出这个理论的学者把他认为根本性的解释变量“抽象”出来,一个是把他认为不重要的、没有直接或重大影响的变量给予“舍象”。总体而言,这是一个抽象和舍象的过程。

舍象是一个哲学语言,不是舍弃,是存而不论。这些存而不论的变量本质上是理论暗含的前提。如果被舍象的变量从量变上升到质变,从没有影响变成有关键性影响,原来的理论就会失掉解释力。理论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一个理论如果不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或者按照这个理论去做不能够实现理论所预期的结果,这一理论就会过时。我们读经济学或读思想史,会发现新的、盛行一时的理论总是在变化。原因就在于社会经济变量一直在变。

今天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源于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总结,内嵌于产生这个理论的国家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关键是,产生这些理论的国家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跟发展中国家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因此,简单地把这些发达国家的理论照搬到发展中国家,难免会出现所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说起来头头是道,实践应用中却不成功。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包括我们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应该根据我们自己的现实条件来总结成功与失败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才对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有更好的参考价值。这也是我这些年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最主要目的。

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目标是收入水平、生活水平能赶上发达国家。普遍的想法是，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低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而生产力水平低是因为没有发达国家那些先进的产业。因此，二战以后盛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是没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先进制造业。所以当时就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提出进口替代战略，采取政府主导的配置资源，去模仿发达国家发展先进制造业。理论很清晰，也很有说服力，但事实是，按照那样的理论去做的发展中国家基本都不成功。而少数成功的经济体所走的道路正好相反，都是从传统落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开始。

到二十世纪 80、9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时，西方盛行的理论是新自由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在二战以后历经几十年还是发展不好？因为只有先进的制造业还不行，更关键的可能是没有实行发达国家完善的市场制度，政府干预过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寻租腐败。这种理论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没有效率，当时也很有说服力。

但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去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经济崩溃或停滞，而且危机不断。有极少数的国家另辟蹊径，如中国、越南、柬埔寨，在转型过程中没有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采用的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渐进双轨制转型，这在当时被公认为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可是现在，能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转型中国家就是中国、越南、柬埔寨。

为什么按照主流理论，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来制定政策都不成功？我认为，正是因为那些理论脱离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条件。比如，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发展不起来先进制造业？因为先进制造业的资本很密集，而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先进制造业违反了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

为什么二十世纪 80、90 年代新自由主义理论也不成功？因为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扭曲，而那些扭曲的存在都有内生原因。已经建立起来的很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或与国防安全有关，或与经济基本运行有关，如果全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建言，把保护补贴一下子都取消掉，这些产业没有自生能力，必然崩溃，使经济基本运行出现问题，甚至危及国防安全。

不仅如此，即便是市场经济，一国从农业、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沿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一步一步往上升级的过程中，也需要政府有为，市场无法解决全部的问题。人力资本谁提供？基础设施谁提供？市场经常失灵或存在失灵之处，谁来解决？所以，并不是只要相信新自由主义，让政府无为，完全让市场决定价格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上看发达国家有什么，对比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或是看发达国家什么东西做得好，对比来看发展中国家什么东西做得不好，然后就建议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拥有的，或是按照发达国家做得好的去做。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很好，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客观规律。

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那些不是天上凭空掉下来的，而是建立在其拥有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一方面，它们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从海外殖民地掠夺到大量的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工业革命以来的长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才建立起大量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资本普遍短缺，所以和发达国家的前提条件、经济基础都不一样，经济运行方



式和上层建筑也应该因地制宜，否则很容易“东施效颦”。

新结构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最大的差异是看自己有什么，即自身的要素禀赋，自己什么东西能做得好，即自身的比较优势。然后根据现

有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把自己能做好的事情做大做强。如果能如此，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有条件、有可能实现如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最后赶上发达国家，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大的世界意义所在。

循序渐进建设数据交易市场体系⁶

黄益平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关于数字经济的探讨，尤其是如何促进数据流通交易，激活数据潜能，在本次高端峰会上可以分享三点看法。

第一点，数据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特殊的生产要素，主要是通过改善经济效率、提高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增长。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已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学中经济活动可以由一个生产函数来反映，即为了获得产出，需要投入生产要素。传统的生产要素有三大类：土地、资本和劳动。无论是工业产品、服务业产品，或者是农产品，基本上都是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投入后所产出的。一般来说，投入的生产要素数量越多，产出就越多。同时，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效率。同样的投入，如果效率比较低，产出就少；效率比较高，产出就多。技术变革、经济创新都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即在给定投入的条件下提高效率、增加产出。

数据也是发挥这个作用。单纯的数据投入不会有任何产出，数据的作用就是使得经济活动的效率提高。所以说，数据更多地发挥类似于技术的作用，相当于给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潜在的推动力。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和资本，供给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国家的土地是既定的，劳动也是一个长期的变量，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很难

会有大幅增加或者减少，尤其针对大国来说；至于资本，可以通过投资不断地积累。仅仅从这三个要素来看，要发展经济就要不断地提升全民的劳动素质，不断地增加资本投入，通过投资促进经济发展。

但是，现在有了数据要素，可以用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大幅发展，为后进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潜在的赶超机会。后进国家如果能够发挥好数据要素价值，就可以加快赶超的速度。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这样的大规模赶超型经济体来说，数据要素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事实上，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看到了数据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无论是从数字经济的规模还是从创新型独角兽公司的数量看，我国都稳居全球第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成就。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比较好，既是得益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也是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成就。

第二点，尽管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成绩不错，数据产出也很多，但是数据的利用率并不高，数据交易很不发达。我国的数据交易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目前我国是全球第二大数据产出国，但交易规模只有美国的3%，日本的17%。所以基本格局是数据量很大，但还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

6. 本文根据黄益平教授于2023年3月在“CCF中国数字经济50人论坛高端峰会”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数据没有真正交易、流通起来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既有卖方不敢卖或者不能卖的问题，也有买方不敢买或者不能买的问题，其中的一个关键障碍是信息不对称。数据交易做不起来，首先一个问题是：数据是谁的？如果说不清楚，很难交易；第二个问题是数据怎么定价，数据交易没有做起来，没有形成市场，供需双方对于一组数据产品的定价也是没有依据的。数据还有一个独特的特征就是非竞争性，对于一项数据产品，你用我也可以用。

数据作为一种独特的生产要素，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要素的治理和交易方式。传统生产要素治理的前提条件是产权清晰，但是数据的产权往往很难界定，这将会影响有效使用。比如，消费者在平台上留下数字足迹，数据和消费者有关系，但是平台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采集数据也付出了努力，这个数据和平台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应该怎么样来界定。如果产权界定不明确，数据交易很难做得起来。

另外，数据交易还会牵涉到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如果管死了，可能无法进行交易；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监管，很可能变成乱象丛生。过去监管不到位，有不少大数据分析实践不合规、甚至不合法的做法也非常普遍。最近发布的《数据 20 条》提供了很多具有创新性的思路，其中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是数据的三权分置。简单说，就是谁对数据有投入、有贡献，谁就可以拥有权益。只要有付出，对一项数据产品的形成有贡献，就可以获得收益的分配。

第三点，发挥数据潜能，应采用相对分散、循序渐进的方式，稳健地推进数据交易发展。《数据 20 条》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思路，就是建立一套交易所体系，是以国家级交易所为引领，这个思路非常好。但是，在具体的推进过程中，可能还需要一步一步来，适合在交易所实现的交易在交易所做，适合在场外成交的可以在场外完成。我们国家的数据交易所数量已经不少，但业务不是很活跃，场内交易占总数据交易量比例可能只

有 5%。另外，目前的很多交易所都是地方政府创办或者起码是按行政区域设立的，数据交易是不是应由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来推动，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知道，数据的生产与流通可能与行政区划没有太大的直接关联度，公共数据共享是一个例外。

事实上，国际上的经验也很类似，正规交易所的业务一般都不太活跃。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正规的交易所业务不活跃？数据交易中有很多问题，如确权问题、定价问题、安全问题和数据非竞争性问题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因为，数据是一个很特殊的产品，在短期内除了一些特殊的应用场景比如征信数据，很难对数据产品进行标准化处理。说到交易所，首先想到的是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所的产品同样有着突出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但是产品是标准化的，无论买股票还是买债券，有很多投资分析报告帮助做决策，或者我们去百货市场买东西，产品放在柜台上一目了然，很容易看到每一款产品是什么用，是否满足，这样对交易非常有益。但是数据产品很多信息是不对称的，产品不是标准化的，还有很多信任方面的问题。

目前比较常见的数据交易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交易所；第二种是点对点交易，有数据的企业直接为有需求的机构提供服务；第三种是数据中介商或数商。当然数商或者点对点也可以在交易所完成交易，但一开始的时候场外更容易也更直接。国际经验也是第二、三种方式比较活跃，主要原因在于在这两种方式下，比较容易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信任的问题。

因此，我国推动数据交易，可能需要考虑一个循序渐进的原则。在经济发展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在经济发展之初就直接建一个大规模、高标准的百货商场。在金融发展过程中也是这样，建立证券交易所往往是在股权、债权交易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集中到一起。数据交易也一样，开始应该允许数据的小商小贩、农村集市开始做起来，等到条件成熟了，再考虑把业务引入交易

所集中交易。交易所更规范、效率也更高，数据交易向交易所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就像农民和厂家都希望能把产品迈到大的市场、正规的商城。当然，这并不是说场外交易不要监管，监管依然是必须的，因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所有的数据交易都应该受到相应的监管。

同时，交易所也可以积极推进一些更规范、成规模的数据交易，包括共同数据的分享等。

总之，数据交易很重要，但切忌拔苗助长，采用循序渐进、几条腿走路的方式，可以更加稳健地推进数据交易的发展。



如何应对新一轮全球主权债务风险？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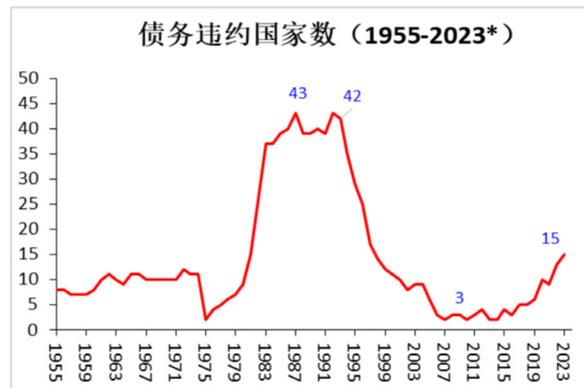
卢锋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

如何看待目前主权债务风险形势？

目前问题主要是流动性 (liquidity) 不足还是偿付能力不足 (insolvency) 风险？是短期矛盾爆发还是周期性过度债务风险释放？对这个问题研判仁智互见。基于以下几点观察，我认为目前形势特点是从早先流动性不足为主向偿付能力问题为主转化，从疫情大流行派生的短期现象向周期性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加剧方向转变。

一是近年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违约增长趋势提示目前危机或不再是短期流动性问题。数据显示上世纪 80 和 90 年代全球每年主权债务违约国家数（含早先发生违约到特定年份仍未走出违约危机国）曾超过 40 个，占世界国家总数比例超过 20%；随着拉美和“重债穷国（HIPC）”债务危机得到治理，年度债务违约国家数下降到 2010 年前后 2-3 个低位。但是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以来主权债务违约数呈上升趋势，2020 年疫情冲击下上升到 10 个，违约国家占比达到 4.65%；近年虽经以 G20 平台为主导的国际合作救助，然而主权债务违约国数仍逐步攀升，目前仍处于违约国家达到 15 个和占比接近 7%。



二是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规模空前扩张构成新一轮主权债务风险的基本背景。从近 70 个

7. 本文根据卢锋教授于 2023 年 3 月在若干部门有关全球主权债务内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整理。

DSSI 资格国数据看，其主权债务总额上升到 2021 年 7547.7 亿美元，相当于 HIPC/MDRI 治理后 2006 年的 3.92 倍。中低收入国家整体（不含中国）债务过去十几年也经历新一轮快速增长，2021 年达到 52525 亿美元相当于 2006 年 3.07 倍。新一轮主权债务扩张派生债务结构若干特点：从债务国负债结构看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国公共债务与非公共债务占比差别较大；从债权方分布构成看中等收入国家（不含中国）私人商业投资者占比远高于低收入国家，双边和多边债权方则呈现“双边回落与多边上升”趋势；从双边官方债权方结构看，美方占比大幅下降与中国占比大幅上升带动双边债权结构整体格局变迁。

三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回落与失衡增加成为主权债务风险上升主要内部根源。首先从经济增速看，中低收入国家 2000-2014 年间年均增速约为 4.3%，2015-2021 年为 2.5%。其次从通胀看，低收入国家从疫情期 2019 年 2.8% 飙升到 2022 年的 10.5%，中等收入国家从 2.7% 上升到 7.1%。又次从出口看，新世纪最初 15 年中低收入国家出口年均增幅为 9.6%，2015-2021 年的出口平均增速下降到 2.2%。复次从 FDI 流入看，中等收入国家的 2000-2004 年的 890 亿美元，增长到 2011-2015 年平均 3184 亿美元，但是 2017-2021 年均值反而降到 3030 亿美元；低收入国家从 2000-2004 年均值 24.4 亿美元增长到 2011-2015 年均值 165.7 亿美元，2017-2021 年均值降到 130.1 亿美元。最后不含中国的低中收入国家外汇储备从 2000 年 3054 亿美元上升到 2014 年 18091 亿美元，年均增速为 13.55%，但是此后到 2020 年六年平均增速回落到 2.45%，2021 年如果扣掉分配 SDR 配额影响储备规模不升反降。

四是美西方大通胀与宏观周期逆转构成主权债务风险上升关键原因。除了中国、印度和少数东亚国家外，全球经济今年整体增长回落，美西方应对通胀大举加息导致全球流动性收紧，最近两周美欧银行危机雷声滚滚形势凶险，这些组合

因素成为助推主权债务风险上升的关键外部条件。上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美联储强势加息应对 70 年代大通胀，对随后 20 年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集中发生产生催化剂作用；本轮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激进加息应对 2021 年勃然而起的大通胀，银根紧缩利率飙升并导致最近美欧银行危机风潮，成为加剧新一轮全球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的导火索。

五是国际合作能力短板不利于遏制主权债务风险增长。与历史上主权债务违约主要通过非合作博弈甚至武力冲突方式解决不同，二战后出现国际合作应对主权债务危机新形势，当时美西方国家、巴黎俱乐部成员国、多边国际机构等发挥了主导作用。针对新冠疫情爆发加剧主权债务风险形势，2020-2021 年以 G20 为主要合作平台推出一系列应对风险举措取得积极成效。然而随着全球主权债务风险重点逐步从流动性困难转向偿付能力危机，应对治理方法从暂缓偿债、SDR 分配等舒缓举措转向存量债务重组的结构性治理转变，原有主权债务危机治理框架无法适应新时代环境要求。国际合作能力制约作用增加新一轮债务风险上升。

基于上述观察，笔者认为除非国际社会合作治理主权债务危机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未来一段时期可能会面临全球主权债务违约国家数量进一步显著增长局面。如果全球经济金融形势进一步恶化，在最糟糕情形下甚至可能出现接近上世纪 80-90 年代主权债务违约密集爆发的形势。我国作为最重要双边债权方之一，基于底线思维需对目前严峻形势有清醒认识。

积极稳妥参与国际合作应对主权债务风险需探讨厘清几点认识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对上世纪 80-90 年代主权债务危机国际合作治理较少介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对外经贸合作与债权关系快速扩大，新一轮全球主



权债务风险治理与我国息息相关。我国尚未经历主权债务风险释放和周期调整全过程历练，对合作治理债务危机经验不足处于学习曲线上端。另外美西方对国际合作治理主权债务风险具有某种主导性，我国参与面临利益磨合和博弈竞争。然而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主权债务困境符合我国与各方共同利益，也是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必要选择。对此或需探讨几点关系以厘清优化应对思路。

首先是如何看待现有合作治理主权债务风险模式的创新与续用关系问题。现有国际协调应对主权债务危机模式是通过二战后相关治理实践形成的，表现为从巴黎俱乐部六点原则到IMF多边救助具体程序等一系列规则和方法。对这些既有规则我们要根据当代全球经济格局与债务结构变迁时代条件，基于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对其中不合理、不公平、不适宜因素加以改进创新。近年我国有关部门要求公平合理分配减债负担，要求多边机构和私人债权方参与减债过程，要求多边机构增加债务可持续性模型分析过程和关键参数的透明度等等，从不同方面体现了推进改革创新要求。我国强调把主权债务风险治理与负债国长期经济发展能力培育结合起来，重视在主权债务风险处理中体现我国债权关系形成的特殊经济内涵与逻辑，为主权债务处理模式创新提供了建设性思路。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现有债务治理模式也是现代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实践的产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某些规律性要求。我国经济改革开放时代，对既有国际经济秩序总体坚持补台而不拆台、有条件接受国际惯例的方针，在全球主权债务合作治理领域也需有开放与配合态度。近年我国参与G20缓债倡议（DSSI）与巴黎俱乐部成员传统债权方展开合作，还参与“缓债协议之后的债务处理全面框架（CFDT）”都体现了上述原则立场。总之对现有规则体系既要防范来者不拒和全盘接受的消极立场，也要避免过度防范和草木皆兵心态，在积极参与和创新中维护我国与全球经济发展利益。

其次是适当处理主权债务合作治理涉及多个利益攸关方竞合关系问题。国际合作治理主权债务风险涉及诸多利益攸关方，我国作为重要双边官方债权国必然要与多个异质化对象发生竞合互动，这些对象包括美西方国家、其它双边官方债权方、私人债权方、世行-IMF等多边机构、发展中国家负债方等等。参与方由于共同目标联手合作，然而同时存在利益差异，其间利害关系由于债务治理的技术和专业特点变得隐晦，协调过程涉及集体行动与规则创造显得更为复杂。我国与上述多个对象关系从一般外交方针看具有明显差异，然而在主权债务危机治理共同行动中又需要接受甚至创造统一规则，如何处理多个利益攸关方竞合关系存在困难。

对于美西方国家我们需要识别其一般思路和具体建议中不合理因素，尤其是要抵制回击其针对我国的错误观点（如所谓债务陷阱论）和主张（如要求我国接受不合理负担的主张），然而为有效治理主权债务危机，在其它功能性场合仍需合作与配合。对于发展中国家债务国与非美西方债权方，我国应结合总结提升一带一路合作经验，拓展深化金砖国及新兴经济体之间相互协调，寻求利益交集加强合作以推动主权债务风险治理朝更公平更合理方向演变。对于在债务治理中发挥特殊作用的多边金融机构，我们需基于科学立场与其务实合作，尊重其专业能力和技术优势，同时对其局限性坦率交流意见并推动其改进完善。总之作为新兴大国我们面临原则性分歧场合要坚持正确立场，在更多功能性场合则需求同乘异务实合作，通过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升影响力。

再次是统筹多重政策目标与适当把握目标优先序的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新兴双边债权国，我国参与全球主权债务风险处置治理，必然要涉及多重利益诉求以及微观与宏观层面的多维政策目标：例如在财务目标上保证债务国按时足额偿付所欠债的，在实施债务重组时方案设计选择避免相关合作方发生道德风险，在与美西方合作时保

持话语权与合理权益诉求，尤其是巩固拓展与发展中国家债务方长期合作关系、保证一带一路合作可持续推进发展目标等等。相关目标诉求的多样性与多维度，与上述参与对象的多重性与异质性，是合作应对主权债务危机的题中应有之义。对相关利益目标我们需统筹兼顾，避免顾此失彼；同时也需贴近现实变化动态校准目标优先序，并区分轻重缓急适当处理。

例如我国传统较少公布双边债务信息，这类保密做法在实践中应有其商业或其它方面利益，不过如果坚持这类做法代价增加则需斟酌探讨其目标优先度。首先需明确，我国企业和机构在拓展国际经贸合作形成大规模双边债务债权关系时，出于延续性或便利性考虑对债务信息约定采取保密做法当时并不违背特定国际规则，在全球主权风险较低环境下也不会带来特别问题。不过随着近年全球主权债务风险上升甚至一些国家发生违约危机，国际合作应对治理成为现实重要议题，这时各方了解特定国家债务规模与结构信息必要性提升。这时如果继续坚持原有保密立场可能会在国际上引发质疑和误解。另外近年世行等多边机构升级成员国上报有关债务数据要求，有关数据库利用负债国提供信息已大致拼接出我国双边债权图像，这时我方是否应固守原有做法确需斟酌。

从另一角度看，某些涉及我国更为实质性利益并可能对全球债务治理模式产生显著改进的议题，或许应被赋予更高优先度。一个相关议题是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双边债权关系形成的特征经济内涵及其对债务风险治理的潜在含义。例如与中国债权对应的实物资产具有较长生命周期，其现实市场价格或影子价格具有宏观金融顺周期特点，因而即便在宏观金融周期特定不景气阶段发生偿付困难，对其合理处置选择中诸如展期重组或债转股等非减债方法潜在具有更高价值。如何在这方面形成既符合经济金融规律，又与我国及发展中国家债务方利益契合度较高，并有助于推动主权债务风险治理模式创新的分析思路与政策建议，应是我国需重视的研究课题和政策目标。

我国积极推动全球主权债务危机合作治理的几点建议

一是采取变通策略推动多边机构参与减债。我国建议多边机构共同减债是合理的，然而世行等多边机构以其特殊地位、融资信誉和历史惯例为由尚未接受这一建议。考虑目前相关意见分歧难以化解，并实际上成为 IMF 对危机国展开全面救助的程序性制约因素之一，我国可在坚持原则同时调整策略以突破僵局。例如可考虑借鉴上世纪 80 年代提出并经过多国实践的债务自然互换机制（debt-for-nature swap），把世行高度重视的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治理所需资源筹集投放与多边机构接受减债承诺结合起来，据此探索走出僵局的新机制设计和路径。

二是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债务结构差别很大，应采取分类治理方针治理主权债务违约风险。WB-IDS 数据显示，1981-2021 年有连续外债数据的 22 个低收入国家私人债权方 2017-2021 年平均占比不到 18%，而 71 个有连续数据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含中国）私人债权方占比接近 60%，是前者三倍多。与此相适应，低收入国家双边官方债权方与多边机构债权方上述五年平均占比，要比中等收入国家分别高出一倍多或 8 成。考虑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都可能受到新一轮债务违约浪潮冲击，在上述债务结构差别如此悬殊背景下，对中等收入国家债务危机救助应推动私人债权人更多直接介入，对低收入国家风险则由公共债权方共同承担较多责任，避免一刀切（one size fits all）思路弊端。

两类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的债权方构成
(2017-2021 年均值)

	低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私人债权方	17.9	59.6
双边官方债权方	35.8	14.9
多边机构债权方	46.3	25.5



三是区别应对针对与我国密切相关议题。例如要明确驳斥一度流行的中国债务陷阱论。对我国双边债务数据透明度问题也不必刻意回避，可在澄清我国做法自然演变缘由基础上，采用新老分开和新事新办思路逐步务实调整。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要针对我国对外双边债权债务关系赖以形成的特征经济内涵，揭示这类债务偿付困难不同于其它类型债务的背景原因、制约条件及其对债务风险治理方式的可能影响。一个可能分析结论是，对这类以基础设施与生产设施作为底层资产的债务债权关系，在由于国内外宏观金融环境变化引发债务偿付困难时，采用展期、债转股等非减债应对方式或更具有经济合理性。

四是以合作应对主权债务风险为契机，总结经验改进不足构建一带一路合作升级版。相关国别案例研究显示，我国企业走出去实践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由于经验不足与机制不完善尚存一

些问题，如不同机构在个别国家自相竞争派生过度投资风险，对负债国项目推介的机会主义动机缺少有效识别防控机制，个别项目存在权钱交易问题等等。这些局部个别现象对我国涉外经贸合作带来效率与声誉损失，也会对债务可持续性产生边际影响。结合治理债务风险加强“政策沟通”，通过总结经验补齐短板使一带一路合作提质增效行稳致远。

五是鉴于国际合作治理主权债务风险的复杂性、专业性与敏感性，需加强跨部门指导协调。这方面工作涉及国内外交、财政、央行、援外、政策性银行、国企等多个部门，专业性和政策性强，具有利益敏感性，并且我方现阶段面临经验不足制约，因而亟需在中央层面设立跨部门的统筹和协调机制，以便在新一轮主权债务违约风险集中释放早期阶段，对相关工作提供必要的顶层设计和指导整合。

数字货币的经济逻辑⁸

徐远

北大国发院金融学长聘副教授

我从2013年开始关注比特币，至今已经很多年。理解这个领域很复杂，需要关注的因素很多。有句话是这么讲的：“当面对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想要搞懂它，最好的办法就是写一本书”，于是边学边写，就有了《货币的界碑》这本书。希望这本书对大家理解数字货币这一新生事物有所帮助。

比特币之所以复杂，是因为至少有三重属性，交织在一起。

第一重，技术属性。区块链是一套数学技术。大家可能都听过“哈希函数”“数字签名”“共识算法”“挖矿”等名词，没见过的容易一头雾水。我们必须花点时间先理解它们，否则还没开展研究，就被这些技术性名词拦在门外。

第二重，金融属性。比特币是一种新型金融资产，金融属性强烈。比特币的价格怎么定？有没有一个公式？与其他资产价格有什么关系？在配置加密货币该考虑什么？金融属性因为没有确定性答案，比技术属性更复杂。

第三重，货币属性。比特币是不是货币？这个问题争议很多，大家见仁见智，争论中既有客观讨论，也不乏主观的、甚至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元素。严格意义上，比特币不是货币，因为货币作为交易媒介，要有稳定的价值，比特币自身的技术特点导致它很难具备这些功能。

尽管如此，比特币的货币属性非常重要，帮助我们看清货币的本质，对未来货币的演化会起到重要的催化作用。这也是本书之名《货币的界碑》的来历。

三点体会

今天是新书分享会，我主要分享在写作过程中的体会，最重要的三点。

第一，市场的力量很强大。在我看来，加密货币今天的成就是市场逻辑的成功。比特币2008年左右诞生于极客圈，是技术性很强的新生事物。诞生之初，比特币基本无人问津，价格基本为零。2010年7月左右，日本的比特币交易所Mt.Gox建立，交易量突然上涨，比特币才有了价格。交易所的建立，让比特币有了价格，之后它就能通过汇集资源促进自身的进一步完善。尽管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只要市场创立，资源汇聚，比特币就开始展现多种可能性，市场也随之进一步发育成熟。因此，梳理比特币的过程，让我感受到市场的强大生命力。

第二，现代货币是政府的专利。货币非国家化、货币民主化的观点由来已久，在市场上很有生命力。但是，综合起来看，上述观点未免有点太过

8. 本文根据徐远副教授于2023年4月11日在北大国发院承译论坛第11期“数字货币的经济逻辑”暨《货币的界碑》新书分享会上的演讲整理。



理想化。现代社会，是以国家和政府作为核心组织的。如果没有政府和监管的包容，比特币这样的新生事物很难生长。只有与现有组织方式达成妥协，新的思想才能落地生根。

第三，货币体系正在演变。人类的货币体系，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演变。比特币出现后，演变开始加速。目前，二战以后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不稳定性。

在我看来，货币的演变是观察世界的有意思的角度。货币是市场最基础的公共设施，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未来的货币可能是什么样？未来的货币体系是单极还是多极？人民币将会扮演何种角色？数字技术又会扮演何种角色？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当前全球治理结构、美元体系以及货币政策纪律都在发生变化，客观情况需要我们花更多时间去理解和预判。

接下来我展开讲解这三点体会。

比特币回溯：从一文不名到烟花绚烂

下图是比特币的价格走势图。不难看出，比特币一开始价格很低，后来越涨越高，最高的时候甚至涨到 7 万美元左右。价格波动幅度也很大，上涨之后，常常是幅度高达 80% 的下跌。



上图中橙色线代表对数价格，更容易体现出变化。通过这张图，我梳理了比特币价格一步步涨起来的历史。这也是理解这个新生事物的一个

角度。



比特币的生长过程中有六个关键节点（如上图），逐一分析如下：

（一）诞生于极客圈：寂寞烟花冷（2008-2009）

2008 年 10 月 31 日，关于比特币的第一份白皮书文件《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货币系统》发布。2008 年 11 月 1 日比特币正式上线，这一天可以看作是比特币的生日。此后一直到 2010 年 10 月，大约 2 年的时间里，比特币的价格都是接近于零。由于比特币有耗电成本，有人就用耗电成本为其定价，其实这只是没人为比特币出价时的无奈之举，类似的例子还有比特币披萨等。

（二）交易所的意义：市场发现价格（2010）



比特币有了价格，是交易所出现以后的事情。我们利用网络资料，搜集了比特币发展早期约 11 家交易所的信息，其中日本的 Mt.Gox 是比较知名的一家，一度承载了 70%-80% 的交易量。从上图不难看出，2010 年 7 月 Mt.Gox 成立，此后比特币的价格逐步走高，时间上二者间有非常强的关联性。

在我看来，这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市场一

旦建立，就会发现价格。这一点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也得到反复印证。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如果想推动一件事情的发展，就建立一个市场。反过来，如果想阻碍一件事情的发展，就增加几条管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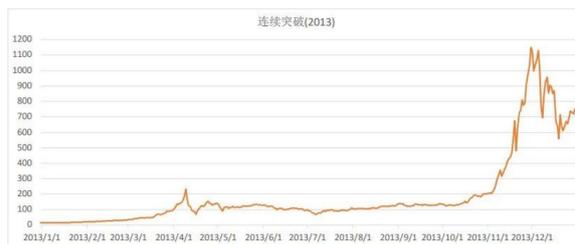
(三) 走进世俗世界：第一次疯狂 (2011)



上图显示了 2011 年比特币价格的疯狂变化过程：从不足 1 美元猛涨到 30 美元左右。综合来看，这一年比特币价格的疯涨主要有三大原因：

1. 交易所成立。这是比特币价格发现和上涨的前提；
2. 媒体曝光。比特币价格上涨引起媒体曝光，从小众媒体到主流媒体，曝光率一路飙升，甚至《时代周刊》《福布斯》这样的大牌媒体也加入进来。这样一来，比特币彻底“出圈”，进入公众视线，其价格也自然水涨船高；
3. 实体机构接受。随着媒体的持续曝光，比特币走出了交易所，开始被很多实体机构接受。例如，非营利组织“电子前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和维基解密（WikiLeaks）分别从 2011 年 1 月和 6 月开始接受比特币捐赠。在支付方面，2011 年 5 月，比特币支付服务商比特支付（BitPay）成立。这家企业堪称比特币世界的 PayPal，是一家替商户做比特币第三方支付的中服务商。截至 2022 年 4 月，这家企业仍在运营中，其 2019 年的交易总价值高达 10 亿美元。

(四) 比特币初长成：价格连续突破 (2013)



从上图可看出，比特币价格在 2013 年 11 月迅速上涨，一个月涨了约 5 倍。

这一次比特币价格的连续突破，既有市场侧的原因，也有监管侧的助力。在市场侧，又有三点值得分析。

1. 比特币从极客圈走向公众，进一步被实体接受，实现了更大范围的普及。2012 年 9 月，比特币基金会成立。这是一家自发成立的组织，旨在向公众和监管机构推广比特币，主要功能包括支付比特币开发者的工资，帮助系统运行等。这一机构的出现说明当时比特币社区已经有了一定规模。2012 年 10 月，比特币支付服务商 BitPay 报告拥有 1,100 家活跃商家。根据 BitPay 官网数据，其 2013 年交易总价值超过 1 亿美元，订单量超过 20 万笔。在 2011 到 2013 年这段时间内，很多商业机构也开始接受比特币，特斯拉也是较早接受比特币的企业之一。

2. 供给侧的“挖矿”逐步实现商业化，成为比特币繁荣的催化剂。以前“挖矿”多是个人行为，到 2013 年出现了“矿池”和“矿机”两个概念。“矿池”是一种保险机制，因为挖矿时的不确定性很大，有时候很长时间挖不到矿，“矿工”可能承担很大风险，“矿池”可以让大家抱团取暖，一起“挖矿”分享收益。“矿机”是专门用来比拼算力的“大杀器”，当个人电脑和普通机器都无法满足算力需求时，就需要“矿机”这种专门挖矿的专业机器。“矿机”的发展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本质是一种算力的竞赛。仅 2013 年一年，就先后出现 ASIC 矿机、烤猫矿机和蚂蚁 S1 矿机等多种矿机。“矿机”既是资本力量的比拼，也是市场逻辑的体现。



3. 交易所的繁荣。比如前文提到的 Mt.Gox。通过梳理发现，华人在比特币交易所中占的份额较大，在中国香港有很多家比特币交易所。

监管侧的原因，主要是监管的包容。

2008 年比特币诞生以后，各国监管层对其都保持沉默，没有公开表态。到了 2013 年 3 月，美国财政部下属机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CEN）为“去中心化虚拟货币”制定了监管指南，把“挖矿”机构归为货币服务企业，受到注册和其他法律义务的制约。在我看来，纳入监管，是一种变相的承认，甚至是支持。

到了 2013 年 11 月 18 日，美国参议院就比特币举行听证会，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美联储无权直接监管虚拟货币”，并且认为比特币及其它虚拟货币“可能拥有长远的未来”。伯南克这番话，蕴含了正面的意义。2013 年 11 月 20 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态“近期不可能承认比特币的合法性”，但是“比特币交易作为一种互联网上的买卖行为，普通民众拥有参与的自由”。在我看来，这也表明了中国央行的包容性态度。

中美两国对比特币的包容性表态事实上促进了比特币的发展。2013 年 11 月是比特币从诞生至今（2023 年 4 月）价格上涨最快的一个月，累计涨了约五倍。

正所谓“涨也监管，跌也监管”，比特币的回调，也反证了监管的影响。在 2013 年 12 月 5 日比特币价值创新高 5 天后，中国人民银行、工信部、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宣布比特币非货币，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流通，并禁止所有金融机构参与比特币业务。通知发布当天，比特币价格应声下跌，从 1127 的高位跌到 1003，后续一直继续下挫态势，短短三天之内下跌将近一半。

（五）投机不是主因：2017 年大涨

1、炒作入场，是福是祸？

比特币在 2017 年迎来了第二波大涨，到 2017 年底时涨到将近两万美元。在很多人看来，比特币的这次大涨主要是因为投机入场所致，甚至一些顶尖期刊上的学术研究也持同样观点。

“投机”这个词，常常带有贬义色彩，但我们必须弄清一件事，即对一种金融工具而言，投机入场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很多投资人愿意去炒热一种金融工具，这说明它有价值。倘若无人问津，说明没人看好其价值。

设问一下：一个炒作严重的产品，就一定没有长期价值吗？比特币的“炒作”已经持续 15 年，从一文不名到近 7 万美元的高价，难道完全是拜炒作所赐？在我看来，具备一定规模的金融市场，总是会有投机进入。

投机是金融市场的内生组成部分。市场如果不允许投机，很有可能市场自己也将不复存在。我认为炒作本身无可厚非，因为它是正常的，甚至是天然的。短期炒作不妨碍长期价值，虽然泡沫是炒作导致，但炒作并不一定就是泡沫。试想，哪个有利可图的市场会没有炒作？真若没有，才真是怪事。

2、真正原因：比特币进一步发展（2014-2015）

2013 年，比特币价格在大涨之后开始回调，在 2014-2015 年，比特币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我认为这才是 2017 年比特币大涨的真正原因。

从 2014 年 7 月起，戴尔这样当时顶尖的公司开始接受比特币。2014 年 12 月，微软也跟随戴尔的脚步，开始介入并接受比特币。值得一提的标志性事件是在 2015 年 1 月，Coinbase 推出美国许可的比特币交易所。2015 年 6 月，纽约州发布 BitLicense，旨在为纽约州客户提供规范的比特币和数字货币业务。与此同时，针对比特币的监管措施也不断发展，并经过几年时间孕育成熟。

因此，2017年投机入场，是比特币市场发展成熟的自然结果。

（六）金融机构接受：步入成熟期（2020-2021）

比特币在2021年又迎来一波大涨，其价格在2021年10月已经逼近7万美元，此后又有所回落，最低时跌到1.6万美元左右。在我看来，这次上涨的诱因不管是什么，背景是比特币已经进入成熟期，大量金融机构接受比特币，很多资产管理公司和大公司开始配置比特币的。商业社会中的主流公司和金融机构把比特币当作一种主流资产去接受，相关监管措施也逐步到位，因此比特币慢慢走向成熟，成为主流的风险资产。

现在，比特币作为支付工具、资产甚至货币，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接受、包容。相比之下，在印度、越南和我国，监管措施相对严厉，限制性较强。然而因为比特币是网络资产，仅仅是少数几个国家的严厉监管，并不能阻碍比特币的成长，除非全球协同一起限制才能奏效。

未来，尽管比特币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厉的监管，但也不会一下子消失。毕竟，监管变严也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过程，也会有阻力。

比特币启示：市场的潜力、政府的权力与货币体系的演进

（一）市场的力量很强大

通过回顾比特币的发展历史，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生事物和新生市场共同成长的过程。通过回溯这一过程，我自己对市场的理解有所加深，对市场潜在的力量、市场的机制、商业的机制，都有了更深的体会。

市场是发现价格并且聚集资源的地方。没有市场，价格无法发现，就无法聚集资源，也无法聚集人气；聚集了资源和人气，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会汇集更多的资源和人气。在此基础上，

相关机制会得到完善，问题会得到纠正，社区也会随之变大。

市场一旦形成，商业机制就会渗入。比如供给侧的“矿池”和“矿机”。

投机是金融市场的内生组成部分。投机并不完全是坏事，一定程度上看，投机意味着很多人的认可。市场波动的背后可能存在多种原因，不可完全归咎于投机，归咎于投机也没有意义。

当前主流公司和金融机构已深度参与比特币。因此，未来比特币监管也会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保持延续性，不可能任意为之。

正如前文所述，在比特币的发展初期，监管的包容促进了比特币的发展。待会儿要说的天秤币（Libra），正是因为遭遇了严厉监管，生长空间受到极度压制，最后胎死腹中。天秤币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合理的理念，但是其中一部分理念与政府的主权货币相互矛盾，甚至冲突。因此，针对天秤币的监管逐渐趋向于打压，导致这个项目最后未能真正落地。

由此可见，对新事物的健康成长而言，与监管达成认同是非常重要的客观条件。

（二）现代货币是政府的专利

在币圈，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想法，比如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等。然而现实情况是，缺乏政府的认同，货币很难发育，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在当前的社会形态下，国家垄断了货币。



上图是天秤币发展的时间线。

2019年6月18日，天秤币白皮书即Libra 1.0发布，提出很多很先进的货币思想。到了



2020年 Libra 2.0 发布时，天秤币已经做出很多改变，明确表示不做超主权货币，只与美元挂钩。尽管如此，天秤币受到的压制并未减少。随着情况进一步发展，在2022年1月31日，天秤币把有关资产卖给一家名为 Silvergate 的公司，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天秤币最终没能成功落地，我认为主要因为它和主权货币之间存在根本矛盾。

天秤币具有三大基础：

1. 技术基础。主要依靠安全、高速、可靠的联盟链。联盟链是很多家机构联盟在一起，技术难度低，但安全性并不降低，所以可以完成比特币无法完成的一些高并发场景。

2. 货币基础。天秤币的货币基础挂住一揽子货币思想，这与现在的国际货币特别提款权 SDR 很相似。这一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凯恩斯二战结束时提出来的“世界货币”的思想；

3. 组织基础。天秤币的组织构架是 Libra 联盟，是一种分布式治理框架。

总体上说，天秤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组织架构上都是比较先进的。如此先进的新生事物为何会胎死腹中？

我们收集了各国监管层的一些表态，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问题。综合来看，各国针对天秤币的表态都比较严厉。比如，2019年7月，时任美联储主席表示，美联储对 Libra 将如何处理“洗钱”“消费者保护”和“金融稳定”存在“严重关切”；时任德国财政部长则认为，Facebook 可能成为影子银行，这种可能应该“为监管机构敲响警钟”；而英国央行前行长曾说，“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将变得系统性的东西，必须受到最高标准的监管”。

天秤币到底有多重要？众所周知，孕育它的“脸书”是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截至2022年1月，脸书有大约 29 亿活跃用户，遍布 167 个国家，占全球人口的 36%。如此庞大的社交网络，倘若

它孕育出一种货币并逐步发展为一种金融基础设施，这种货币很容易成为事实上的全球货币，并衍生出一套商业体系、金融体系。因此，各国监管不可能让它轻易地诞生，必须将其纳入监管才可以谈发展，否则免谈。

天秤币作为一个项目虽然暂时宣告失败，但我认为它包含的思想很难过时或消失。比如，天秤币关于稳定币的思想和布雷顿森林很相似；货币联盟的思想则与 SDR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联盟链的思想稍加改进就成了支撑区块链发展的主体思想。

大胆猜测，未来全球货币体系的演变，可能还是会朝着某种数字货币要素和现有主权货币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在未来，天秤币是否可能转化为某种变体，并与美元相结合？如果真是这样，美国可能会变得更加强大。

从这个角度看，天秤币对人民币国际化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全球货币体系在不断演变中

比特币为何受到如此追捧？这与全球货币政策和货币体系的演变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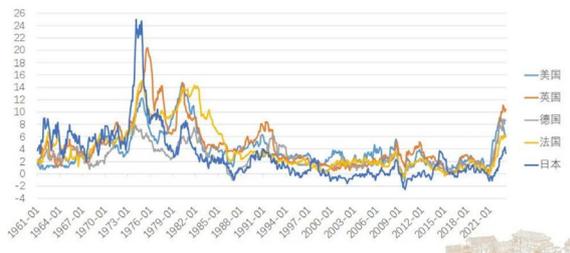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有着非常严格的货币政策纪律。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货币政策纪律开始放松，欧洲亦如此。铸币税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当一种货币发行出来，它不是均匀地分发给人们的，而是需要借助已有的金融体系才能发布出去，人们拿到货币时间有先后，成本有高低。这样一来，先拿到货币的人就比后拿到货币的人具有优势，实质上这是一种“劫贫济富”，因为后拿到货币的人总是相对弱势的群体，交了更多的铸币税。在过去二十年全球货币增发的大背景下，铸币税总量越来越大，“劫贫济富”越来越严重，进一步消耗了主权信用。

既然整个主权信用消耗得很快，这个体系还能持续多久？一个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是支撑全

球货币的全球化正在倒退。伴随这个倒退，全球货币的价值也会随之下降，作为全球货币的美元，其地位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

发达国家通胀 (CPI月同比%，1961.01-2023.02)



随着美元主导地位的不断下降，谁会取代美元让出的那些份额？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各国央行都在积极行动，通过采取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离岸市场等措施，试图逐渐改变目前的货币体系。

美国实际利率：正负之间



发达国家目前这一轮高通胀，也正在伤害现有的货币体系，美国的通胀更是如此。从上图可以看出，目前发达国家的通胀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高。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高通胀状态似乎一时间无法消除。为什么会这样？上图中红色的直线是零点线，蓝、橙、灰三条曲线是实际利率线，不难看出美国目前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已经微微为正，政策利率和十年前国债利率仍为负。一定意义上说，美联储的政策虽然看起来紧，因为加息很多次，但是实际上仍属宽松，因为实际利率

还是负值。在这种情况下，高企的通胀率可能难以下降，因为想要通胀下降，需要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而不是“明紧实松”的货币政策。这使我怀疑美国通胀还会持续，甚至还有可能反复的第一个理由。

工资通胀螺旋：劳动力成本支撑通胀



第二个理由，和劳动力市场有关。在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横轴代表通胀，纵轴代表失业率。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最终推动通胀上涨的因素是工资，工资在CPI里占据很大比例。从上图中不难看出，美国目前核心CPI还是很高，并没有很大回落，核心CPI主要是由劳动力价格驱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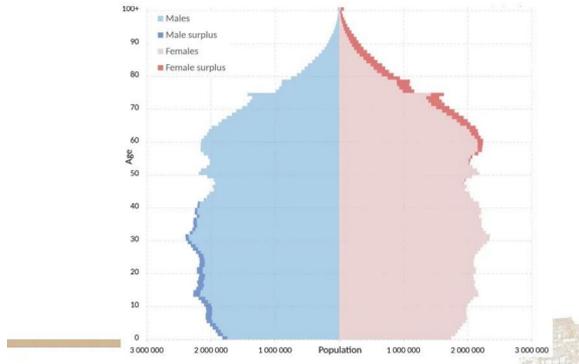
劳动力市场：二战以来最强



如果细看劳动力市场，情况同样吃紧。上图橙色线代表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这一变量剔除了劳动参与率这一指标，然而橙色线的“尾巴”仍然达到了局部高点。所以现在美国失业率很低，劳动力市场很紧，通胀下降的难度很大。



人口结构：雪上加霜 (USA, July 1, 2021)



此外，美国的人口结构也是令通胀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美国人口结构有个特点，即50岁到55岁或60岁年龄段的人口偏少。新冠疫情过后，这部分人面临相当大的再就业压力，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已经退休，很难再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对美国的通胀而言，这也是一个不利的结构性因素。

综合看，目前美国的通胀情况令人担心。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持续多年，政策上就需要加息，

加息后就导致衰退，衰退后就开始降息，降息之后通胀再上涨，反反复复。当时的情景和现在很相似，我认为美国的通胀可能要反复几次。最近美国几家银行先后出问题，尽管目前的信贷未受影响，但不排除未来受影响，经济可能因此陷入短时衰退。一旦经济衰退，美联储加息的步伐可能不得不放缓，美元的信用也会受损，全球货币也会受影响。

总体而言，全球货币体系的发展是从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美元体系。1971年之后，人类正式进入主权信用阶段，直到现在。比特币和天秤币的出现，会起到催化剂作用，催生人类货币体系的进一步演化。

对于整个货币史而言，比特币就是界碑一样的存在。倘若我们有机会站在未来，回头看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更清晰地认识到数字货币的重要性，它的存在和不断演化会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社会组织、政府组织形态，甚至是地缘政治乃至国际关系。这一趋势值得我们好好观察。

不确定性下创业方向的判断与选择⁹

谢绚丽

北大博雅青年学者、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
国发院副研究员、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从大趋势中寻找机会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机会是一种市场的需求，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要从大势中判断机会。战略分析的PEST框架大家都可能都熟悉，其中的四要素—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变化可以帮助大家发现机会的源泉。

政治角度，我国最近刚出台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要让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这一定是创业的重大方向之一。

从经济和社会角度看，现在Z世代已经成为市场的消费主体。城镇化、家庭和人口结构的变化，都带来了许多新需求。比如今天参会的校友中有做宠物行业的创业者，为什么会有宠物的需求？因为现在的家庭变小了，很多人感到孤独，需要宠物的陪伴。

从技术角度，大家可能都有感触，最近通用人工智能ChatGPT的出现是革命性的。很多人在讨论它是否会替代人。其实它已经在颠覆很多的企业了。有一家公司，为腾讯会议做自动会议纪要，千人团队用时一年，准确率只有60%。而现在ChatGPT可以做到90%的准确率。完全是降维打击。

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这四个角度看，

创业仍有很多机会。但也听到很多人说，不敢去创业，因为现在面临的不确定性太大了

确实如此，突如其来的疫情，俄乌战争、中美摩擦；硅谷银行破产，瑞士信贷重组，德意志银行大跌…周边的世界并不平静，动荡背后是各国在经历社会转型，全球化受益和受损的双方新一轮的博弈。经济和社会的周期像钟摆一样反复，虽然背后其实有迹可循，但我们无法选择面对的时代。

该怎么办？真正的企业家不会选择躺平，因为拥抱不确定性正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我的课上会讲到三个有关创业的经济学理论。第一个是熊彼特的创新论，认为企业家是创新者。第二个是柯兹纳的警觉论，认为企业家是套利者。第三个则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奈特（Frank Knight）的不确定性论。他认为不确定性是企业产生的根源，企业家正是通过承担不确定性而获取利润的人。不确定性虽然被一般人所厌恶，但对企业家而言可能反而意味着机会。提出“黑天鹅效应”的畅销书作家塔勒布在《反脆弱》一书中也指出，“有些人能从冲击中受益，当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下时，他们反而能够茁壮成长。”所以，不确定性的时代更加呼唤企业家精神。

如何在不确定性之中寻找机会？分享几个我

9. 本文根据谢绚丽研究员于2023年3月25日在北大国发院MBA中心与HICOOL商学院联合主办的创业分享活动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的观点：

第一，中观产业的变革机会

我国大量产业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一个变化：从最早外企主导，到后来的国内企业模仿，到现在的国内企业追赶甚至超越。这意味着什么呢？很多的行业原有的结构可能都有机会被打破，从而建立新的秩序。

举例来讲，纸尿裤产业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在我国已经是一个几百亿的市场。这个市场的增长也是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2000年中国婴儿纸尿裤的市场渗透率仅有2%左右，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给孩子用纸尿裤。到2021年，渗透率已经达到82%，接近欧美的水平。使用量方面，中国是平均3片多，欧美是5片左右，所以我们未来仍有发展空间。

这个产业与我国许多产业类似，在结构上高度集中，国际品牌如帮宝适、好奇、日本花王等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2013年，四个国际品牌占据了我国66%的市场份额，剩下的市场被本土二百个以上品牌分割，每一家规模都非常小。但是到2020年，这个格局已经产生了变化，前四家国际品牌的市场集中度下降了一半，只占35%，其余65%被中国本土企业占据。

中国本土企业为什么能实现反超？因为一个重大创新，复合芯体技术的出现。所谓复合芯体，就是纸尿裤的内部吸收层不再用原来的木浆绒毛，而改用一种高分子材料。带来的结果就是纸尿裤更薄，贴合性更好，侧漏可能性更小。这种复合材料不像过去的产品那样容易断裂，并且更干爽，宝宝的臀部皮肤也不容易泛红。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是一个具有重大价值提升的创新。

有意思的是，这个创新并非来源于国际巨头，而是中国企业推出的。后来80%以上的中国厂商都采用了这种材料，然而那些国际巨头并没有马上采用。这里有种种原因，其中之一是，大象难以起舞：当企业做到非常成熟、规模非常大时，转型和创新反而更难；并且，这只是中国地区的

创新，如果世界其他国家销量仍然可观，采纳一个区域的创新似乎没有那么必要。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复合芯体纸尿裤本身是一个颠覆式创新。为什么是颠覆式？传统纸尿裤使用全自动生产线，投进原料，出来就是纸尿裤。整个生产流程非常精密，设备成本动辄上千万。但是复合芯体纸尿裤的生产分解了这个一体化的流程：复合芯体作为纸尿裤核心组件交由专门的供应商生产，然后作为一种材料运至纸尿裤加工工厂。这一创新最大的优势就是降低了生产的成本和难度。作为一种结构性创新，模块化、分步式的生产使行业进入门槛急剧降低，不到一千万人民币就能投资设备，生产出高性能的纸尿裤，颠覆了在位者的固有优势。

面对创新引发的行业机会，不少新企业纷纷进入，迅速取得了发展。例如一家由80后设计师团队创立的企业的纸尿裤在天猫商城的销量增长最快。它注重为Z时代父母提供高颜值的母婴产品，产品包含尿裤、纸巾湿巾、喂哺、玩具、孕产、出行、家居等众多品类，目前已国际化进入30多个国家。由于多品类运作，它反而具有其他纸尿裤厂商不具备的优势：纸尿裤很可能成为其引流产品，而利润可来自于其他母婴品类。

这个案例典型地反映出，产业中，存在大量创新升级，重新洗牌的机会。

第二，微观市场的需求机会

中国非常独特的一个优势是有14亿人的大市场，市场潜力巨大。例如美团当时在考虑是否做外卖时，先去欧美考察，却发现这个行业在当地需求不大，似乎不值得做。但美团后来考察了国内另一家外卖企业，发现其在能盈利的情况下仍然保持200%的高速增长。中国和其它市场的差异性导致有不少中国可能是独有的创业机会。

为什么外卖在中国是个好生意？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使得中国家庭的规模越来越小。在家庭规模比较大时，做饭还比较划算；但如果家庭规模小，为了做一两个人的饭而折腾一番，还不

如到外面获得专业化的服务。所以，从人的基本需求考虑，让做饭这件事专业化一定是个趋势。同时，中国人口密度大、智能手机普及率高、电动单车成本低，这一切都使得外卖行业在中国的成本更低。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中国这个大市场，并且回归到人的根本需求：衣食住行、娱乐、社交，就一定能找到巨大的商业机会。

举例来讲，疫情影响下，很多人可支配的钱减少，消费模式改变，大家开始更多地关注性价比，都想花更少的钱买到高品质的商品。日本的优衣库是性价比的鼻祖，它正是崛起于日本经济低迷时期。最近有不少销售临期食品连锁店得以快速发展，抓住的也是现在对性价比的追求。

与高线市场关注性价比对应，下沉市场消费在升级。很多人以为这些市场的需求仍是低价低档产品。实际上，根据中国某电商巨头切入下沉市场得到的用户反馈，在三线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地区市场，酒精湿巾的销量在以60%的速度增长，筋膜枪的销量增长率接近5000%，其他增长最快的产品还包括洗碗机、植物盆栽、收纳盒、葡萄酒、蛋白粉、茶盘等。这些不正是一、二线城市消费者也在买的产品吗？所以，下沉市场同样蕴含着巨大的机会。

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

机会永远存在，如何利用机会也有迹可循的。这里我讲三个供大家参考的方向。

第一点就是赋能。前面讲到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其实数字技术并非一日千里，而是一步步渗透发展，已经在深刻影响我们的商业。最早期是静止的网站，后来顾客和企业开始互动，催生了电子商务。再之后，企业发现了数字化营销。在数字化商业阶段，产品本身已经数字化，比如音乐、书籍。未来的发展阶段是智能商业，人工智能与商业进行深度融合。因此，用科技给

各行各业赋能，会带来巨大的价值。所有产业都值得用新技术重新做一遍。例如，做教育培训的企业可以尝试用人工智能生成课程大纲，分析学生特点，帮助因材施教。如果企业把人工降低到10%-20%，辅以80%-90%的人工智能，即便价格降一半，仍有利可图。因此，“赋能”是我们第一个要关注的方向。

第二点是借势。什么叫借势？有时，小企业凭借自身力量去发展很难，这时可能需要搭上一条“大船”。很多大平台提供这样的机会。例如前些年，亚马逊是一艘大船，给很多企业带来了扬帆出海的可能性。现在是抖音，可以助力小微企业快速做大。当然，不是所有的平台都有足够的势能，也不是所有平台上的企业都能成功，但借势这个思路很重要。在不同的时代，可能需要借不同的势。在当前的时代，企业需要学会用互联网为自己造势。

第三点是破圈。大家来自各行各业，可能有人觉得自己的行业太“红海”，竞争太激烈，还有一些行业可能受到强监管，很难施展，等等。这时，为什么不破圈？市场不限于你目前这一方天地。以出海的服装品牌SHEIN为例。在国内服装电商竞争已经白热化的环境下，SHEIN利用电商的经验，结合中国的产业链优势，再加上数据分析能力，去海外做服装电商，形成降维打击，迅速做成估值千亿美金的“独角兽”企业。

再举一个例子，ANKER，靠一个很窄的品类，数码充电设备，现在销售额已到百亿以上。它创始团队有我们的校友。创始人是北大计算机系毕业，在Google美国工作期间，写了一个代码放到亚马逊上卖笔记本电脑电池，发现很赚钱，就离开Google，回国创立了ANKER。前面几年就像亚马逊上的很多小商家一样，继续做跨境电商贸易。但是从2016年起，ANKER转型成一个产品公司，持续地投研发，提升产品力，做全渠道和全球的扩张。2021年ANKER收入133个亿，有八千万用户，1000个以上自有专利，收入里面有95%都是来自于海外。



ANKER 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前面提到的“借势”，成功利用了亚马逊平台实现了高速的成长，亚马逊上的销售目前仍占收入很大部分。此外，他们一个关键方法论，VOC (Voice of customer)，也是基于亚马逊上的用户评论。借助 VOC，他们开发了很多创新产品。例如很多人手机充电线用不了多少次就断了，露出里面的金属丝又难看又不安全。ANKER 识别到这一痛点以后，把充电线和插头的结合部分做了加强，采用了新的材料。顾客使用之后发现非常结实，用来拉汽车都不会断，于是昵称为“拉车线”。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创新，但解决了顾客很大的痛点。一根线，成为了一个爆品。

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

有了方向以后，还要找到正确的方法。

面对同样的创业机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如何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需要从用户的痛点出发，真正体会用户的需求，然后基于此设计产品和服务，提供新的客户价值。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你的产品和原来的产品之间必须达到十倍以上的优势。因为用户有使用习惯，如果你的产品优势不够强，他们不会转移。

那么，如何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

人性洞察。我们日常面临的每个问题背后其实都是一个被精巧掩饰的机会。例如，分众传媒创新了电梯广告这种模式。创始人江南春是中文系毕业，所以就从人的角度出发。一个人如果一个星期没去过王府井，这很正常，但是一个人如果一个星期没回过家，或一个星期没去过上班的写字楼，就不太正常。所以，与其在商业中心扎堆做广告，居民楼、写字楼的电梯广告一定是空白的市场。好的解决方案基于人的生活轨迹和真实需求。

经验塑造。哈佛大学的学者发现，71% 的创业者的创意来自于之前的工作经验。为什么鼓励

大家先去就业，再去创业，也是这个原因。举个例子，字节跳动一个重大创新是推荐算法。为什么会有这个创新？源自张一鸣自己的经历。他在酷讯做工程师时，春节想回家，发现火车票买不到。传统搜索网站是人找信息，他就想，为什么不让信息来找人？他当时做了一个自动在网上搜索车票信息的小软件，如果有票就马上通知他，结果半个小时就买到票了。所以，从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是一个重大的创新，也奠定了头条、抖音、TikTok 等竞争优势的基础。

试错调整。没有一个创意是完美的，而且 99.99% 的创意在刚拿出时都有问题，怎么样让它真正成为一个重大需求，最终获得成功？需要不断地试错和调整。相应的建议就是要走出办公室，因为办公室里并没有顾客。Airbnb 的创立源于创始人为了支付房租，让订不到酒店的人住到自己家的气垫床上。之后他们做了一个出租房屋的网站，但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什么访问量。很多人觉得这个创意太疯狂，真的有很多人会愿意住到陌生人家里去吗？于是他们去访问自己的用户：为什么你会把自己房子租出去？为什么你愿意住到别人家？从用户中获得了深刻的洞察。比如，其中一个房主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他住的城市出现过动乱，动乱发生之后，好几个以前租住过他房子的用户给他打电话，关心他是否平安，令他非常感动。“不是简单的住宿提供商，而是一个连接旅行者的社区”，找到了真正产品价值的 Airbnb 获得了高速的增长。

选择适合自己的机会

有了好的方向，对的方法，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机会。

再举 ANKER 的例子，最近他们有三个内部放弃掉的产品——自动割草机、电动自行车、扫泳池的机器人。为什么他们会放弃？是产品的市场不够大吗？不是，这三个产品的市场规模都够

大。放弃的本质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如果要做出非模仿性、极具创新性的产品，技术的投入和难度太大，距离他们现在的核心能力太远。

我们今天肯定能识别到非常多未被解决的大需求，但可能并不全都属于你，原因可能是你解决不了，或者你解决的代价过于巨大。

如何去选择符合自身的机会？想想你是谁？

你知道什么？你认识谁？这些构成了你的资源基础，也是你选择创业方向的出发点。和你自身匹配的方向才是属于你的机会。核心是：在无限远大的野心和必然有限的资源之间取得平衡。

在不确定的时代寻找确定性。创业将不确定性转化成确定的产品和服务。希望大家都能成为定义未来的人。



北大国发院校友会在杭州举行多场活动

2023年4月14-16日，由国发院校友会和国发院浙江校友会共同组织和邀请，北大国发院各区域和行业校友齐聚杭州，举办多场重大活动，包括召开浙江北大国发院校友会成立大会，参观浙江校友会办公室并举行揭牌仪式，举办北大国发院校友会2022年度总结及表彰大会，举办北大国发院校友会首期【承泽师说】品牌论坛，开展北大国发院校友杭州游学活动。北大国发院院长、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姚洋，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吴晓波，北大国发院助理院长、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张丹丹，浙江省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院长、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双学位校友蒋云，浙江省北大校友会会长陈云峰，北大国发院校友会总会长周延，浙江校友会会长黄海燕等国发院师生、校友，各领域专家、学者和杰出人士，以及各校友组织负责人、组织成员出席系列活动。

北大国发院联合主办中国老年健康调查(CLHLS)第九次调查数据发布会

2023年4月6日，中国老年健康调查(CLHLS)第九次调查数据发布会召开。会议由北大国发院、北大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泰康长寿时代研究院、泰康公共卫生与流行病防治基金、武汉大学董辅初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联合

主办。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兼医学部部长、国发院EMBA校友唐其柱，北大国发院教授、北大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荣誉主任曾毅分别做开幕致辞。北大国发院党委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大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晓燕，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北大国发院校友沈可出席发布会并分别介绍相关情况。北大国发院教授、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北大国发院教授、北大社会调查中心副主任赵耀辉参与点评和讨论。

北大国发院多位教授受邀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并与凤凰网联合主办活动

2023年3月28日至3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北大国发院联合创始人、国发院经济学教授易纲，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姚洋，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北大国发院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联席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等多位学者受邀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官方活动。本届论坛期间，北大国发院和凤凰网财经还联合主办“2023博鳌凤·凰网梧桐夜话”论坛，姚洋院长与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等与会并做主题分享。

北大国发院五位学者荣登爱思唯尔 2022 “中国高被引学者” 榜

2023 年 3 月 28 日，国际学术出版机构爱思唯尔 (Elsevier) 发布 2022 年 “中国高被引学者” (Chinese Most Cited Researchers) 榜单，北大国发院五位学者上榜，且均集中在“理论经

济学”领域。这五位上榜的北大国发院学者分别是林毅夫、雷晓燕、赵耀辉、曾毅、黄益平。这也是爱思唯尔 “中国高被引学者” 榜单发布 9 年来，北大国发院多位学者第 9 次上榜。本次榜单中共有 5216 位各学科最具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北京大学共 185 位学者上榜。

版 权

主 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主 办: 北大国发院智库 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

主 编: 黄卓

执行主编: 王贤青

执行副主编: 白尧

编 辑 部 (按姓氏拼音)

曹毅、高玲娜、刘海波、王勋、王志勤、朱丽

电子订阅方式

扫描本二维码, 填写联系信息



合作联系方式

电话: 010-6275 9033

邮箱: ybai@nsd.pku.edu.cn

官方网站

www.nsd.pku.edu.cn

官方微信公众号



北大国发院



北大国发院智库